

甘肃礼县三座周代城址调查报告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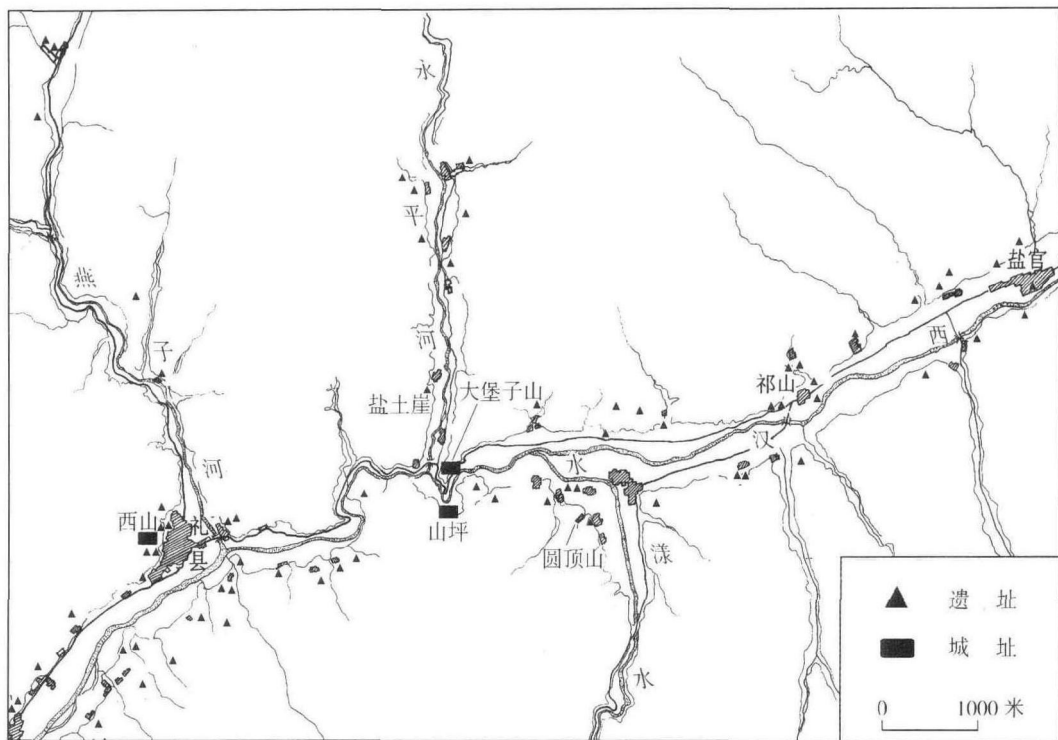
In 2005 and 2006 three Zhou 周 castle sites were discovered at Xishan 西山, Dabuzishan 大堡子山 and Shanping 山坪 in Lixian 礼县 county, Gansu 甘肃 province during archaeological surveys. The castle at Xishan is over 87000 sq m in dimension and features Western Zhou 西周 architectural foundations, chariot and horse pits and pottery drainpipes. Dabuzishan castle is over 550000 sq m in size and contains a north wall and cemeteries. The construction of Dabuzishan castle was later than that of Xishan castle, and it was abandoned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春秋 period. The report presumes that both of Dabuzishan and Shanping castles were the new capitals built by the Qin 秦 people when they moved from Quanqiu 犬丘.

早期秦文化研究课题自 2004 年启动以来,已先后进行了西汉水上游遗址普查、鸾亭山汉代祭祀地点发掘和西山遗址发掘等重要工作^[1]。通过 2004 年春季的遗址普查,课题组认为,西汉水上游的周秦遗址有“六八图-费家庄”、“大堡子山-圆顶山”和“西山-石沟坪”3 个中心区域。为进一步明确秦人的都邑遗址,2005 年 10~11 月和 2006 年 4~6 月,我们又进行了两次有针对性的小规模调查。在前此工作的基础上,确认或发现了西山、大堡子山、山坪三座周代城址(图一)。

此次工作由于人力所限,没有采取系统化、全覆盖的调查方法,采集遗物虽用 GPS 和电子地图记录了空间位置,仍然难免传统调查随机性强的局限。所幸调查区域位于山地,因断面暴露可观察到较多的遗迹,有助于加深对遗址的认识,我们对此特点加以充分利用,获取了比较丰富的信息^[2]。

[1] a.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西汉水上游周代遗址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 年第 6 期; b.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4 年甘肃礼县鸾亭山遗址发掘主要收获》,《中国历史文物》2005 年第 5 期。

[2] 基于工作的针对性,本报告只介绍周代遗存,不包括在三座城址内发现的史前遗存。周代遗址指西周至战国时期的遗存。



图一 三座周代城址在西汉水上游的位置

一、西山城址

（一）以往工作与发现经过

西山遗址位于礼县县城西侧、西汉水北岸的山地上。遗址东、南两面俯视燕子河与西汉水交汇的宽阔谷地，西面与山体相连，北隔刘家沟与鸾亭山相望（图版七）。

1947年，裴文中、米泰恒等先生首先对此遗址进行了调查。当时已注意到遗址有史前和历史时期两个阶段的堆积，其中“上部灰层中含灰色绳纹陶甚多，多为三短足之鬲”。当时发掘的一座墓葬，出土陶鬲3件、陶罐2件。由于堆积丰厚、地层复杂，他们认为“此地点颇有发掘之价值”〔3〕。

解放以后，该遗址历年出土遗物不断，仅入藏礼县博物馆者，即有商周之际的青铜鼎、鬲〔4〕，多件周代的陶豆、绳纹陶鬲，以及成组的寺洼文化陶器。1958年，甘肃省博物馆在西汉水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发现周代遗址14处，其中雷神庙遗址（即西山

〔3〕 裴文中《甘肃史前考古报告》，《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4〕 礼县博物馆、礼县秦西垂文化研究会《秦西垂陵园》附录《礼县境内所出与秦文化相关器物》，图版二八、三〇，文物出版社，2004年。

遗址一部分)被认为是比较重要的6处之一,并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

2004年春,早期秦文化课题组在西汉水上游进行遗址普查,除了印证这里有史前、周秦、汉及汉以后各时期的丰富遗存外,还发现了陶水管道和大量的被盗墓葬。

2005年春夏,王建新、赵丛苍率领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的同学在西山遗址进行田野实习。6月14日,杨惠福、王辉等课题组专家在慰问工地时,通过访问当地群众,获悉雷神庙台地的边缘暴露有一段数十米长的夯土。在场专家观察后一致认为,这个迹象非常重要,当即安排进行钻探。截至7月下旬,铲探发现的这段夯土的长度已达108米。

当年10月,调查人员偶然在西山北坡的刘家沟中发现夯土和丰富的堆积。经过数天追踪,共见到保存较好的夯土360余米。联系此前的发现,这段夯土应为西山城址的北城墙,而围绕雷神庙台地边缘的夯土应该是城址的东墙和东北角。

2006年4月,调查人员对城址内外的雷神庙、刘家沟、大小雪坪、鸾亭山山腰等各区域再次进行了仔细调查和遗物采集,并详细记录了各种发现(图四、附表一)。同时,在西山南坡进行了仔细寻找,发现了仅存断续残迹的西城墙和南城墙一部。

(二) 遗迹

整个西山遗址分为城址及城外南、北的居址和墓地,依地貌单元及当地习惯,城内部较平缓的台地称为雷神庙,城南称为小雪坪、大雪坪(以一道冲沟相隔),城北称为刘家沟。另外,隔刘家沟与西山相对的鸾亭山山腰遗址区,从堆积内容和年代判断,应与西山遗址关系非常紧密(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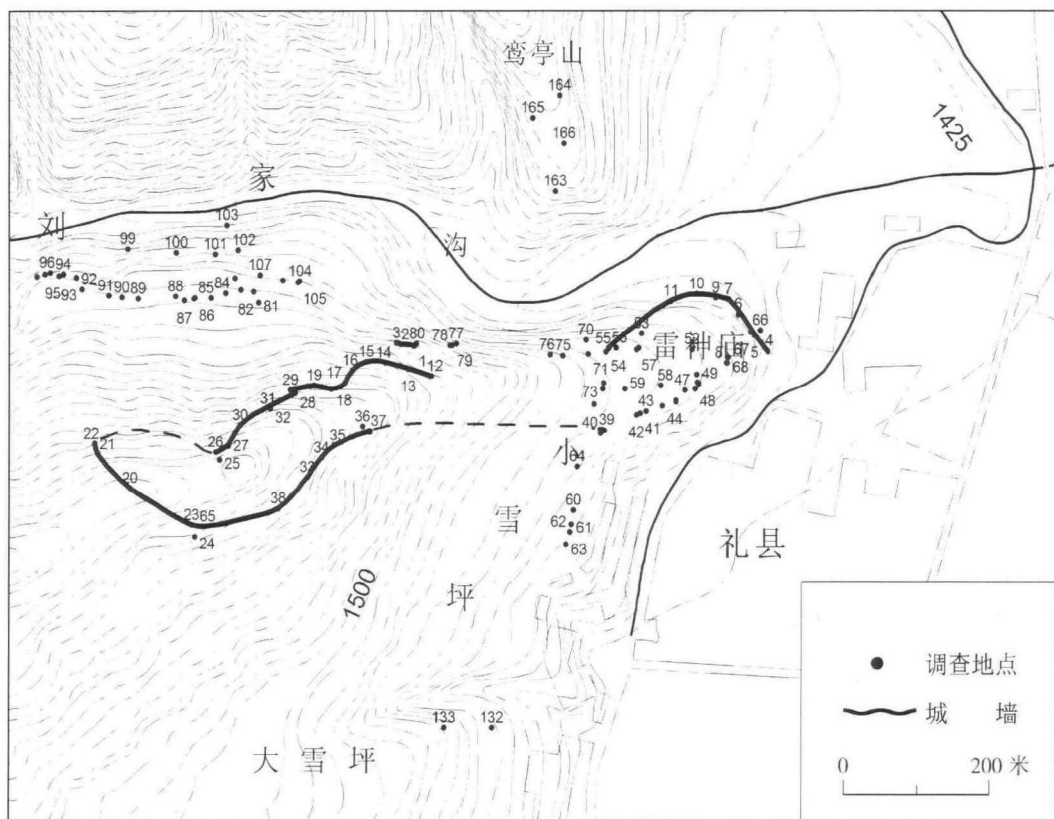
1. 城址

城址坐落在东西走向的山体上,依山势呈不规则的长条形,西、北两面残长约180、1000米,东、南两面残长约100、600米,总面积约8.7万平方米。城址内部西高东低,西部为陡峻的山梁,东部随着高程降低而地势逐渐平缓,是遗存主要的分布区。按城墙上的最大和最小高程计算,城址总落差达150米。

城墙一般覆盖在厚达数米的自然堆积之下,保存状况以北墙和东墙较好,除北墙中段外,皆可连续不断,夯土厚度达3米以上(包括基槽部分),宽度一般为5~6米。西墙和南墙则只保存断续的残迹,东南角至今没有发现,从地形看可能已完全塌毁。多个地点(参见附表一)都发现较厚的路土直接叠压在夯土上的现象,由此推知,墙体毁弃后曾长期作为道路使用。

城墙的建造方法为夯土版筑。为取平工作面并防止墙体向山坡下方滑落,夯筑前先在山坡上切削、整平,形成半个基槽,这种方法屡见于背依陡坡的东墙、北墙和南

〔5〕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西汉水流域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第3期。



图二 西山遗址各区域位置图

墙。西城墙的情况比较特殊，由于建在山顶，其下开挖了完整的基槽。以23号地点显示的横剖面为例（图三左），基槽口宽7.5、底宽2.1、深2.2米。外侧两版夯土宽2.4、2.3米，夯至基槽口后，先将墙基与基槽壁之间的空隙填满夯实，内侧再增加一版1.5米宽的夯土，继续向上版筑以成墙体。从露出较长的段落来看，基槽底面随山势不同而有差异。其中平缓地段的基槽底面基本水平；倾斜地段为了取平，逐段挖成阶梯状。墙体每版夯土的长度不定，以1.5米左右最常见。如6号地点显示的东墙纵剖面，基槽底面基本水平，深1.3米，连续十版的长度分别为1.5、1.55、1.47、1.75、1.5、1.77、1.16、1.88、1.5、1.63米（图三右；图版八：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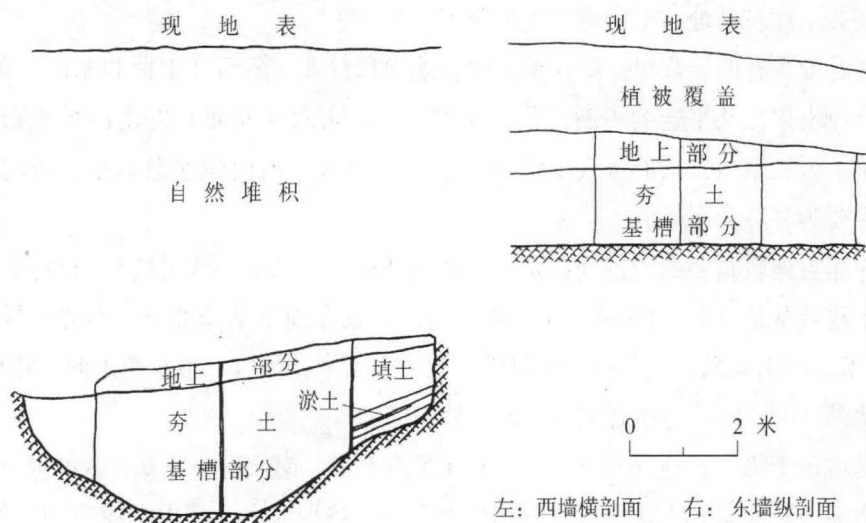
墙体夯土多取用当地的黄色及黑灰色生土筑成，结构致密坚硬。夯层一般厚7、8厘米，最厚约10厘米，夯窝为直径4.5~5厘米的浅圆形（图版八：2、九：1）。

由于尚未发现早于城墙的商周时期遗迹，夯土内的包含物又非常罕见，城墙始建的年代目前还不太清楚。根据西周晚期的灰坑打破城墙夯土，春秋早期的小房址叠压在城墙的夯土上（图版九：2），我们推测，城墙至迟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已经废弃。

2. 城址内外的遗迹（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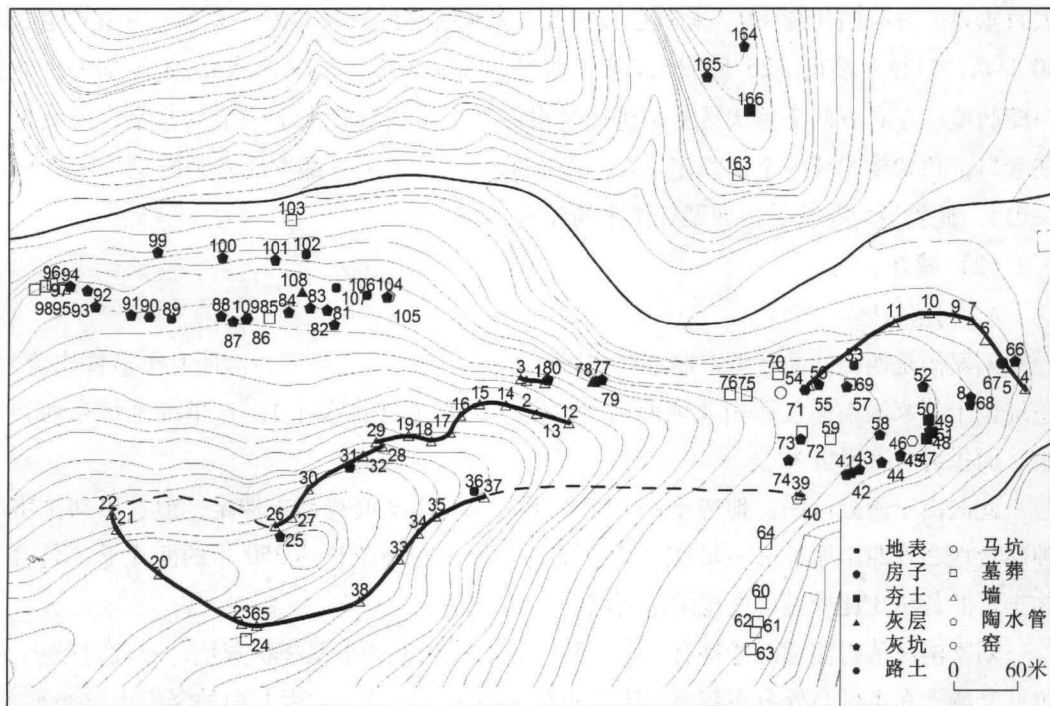
(1) 城内

遗迹主要位于东部较平缓的雷神庙台地，高出西汉水河床 30~55 米；西部山势陡峻，地形局促，只发现了少量灰坑，如 25、31 号灰坑。



左：西墙横剖面 右：东墙纵剖面

图三 城墙剖面图



图四 西山遗址遗迹分布示意图

雷神庙台地是西山遗址堆积最丰富的区域之一，面积约4万平方米。这里的地势原为缓坡，平田整地时被改为阶梯状的多级台地，断崖高度多在3米以上，有的达到5、6米，原生堆积破坏严重，只在台地前缘保存较好，暴露出来的灰坑、墓葬数量很多，还有夯土建筑基址、车马坑等遗迹现象。

遗迹的分布有明显规律：第一至第四台地面积较大，阳面（南面和东面）的灰坑、文化层分布密集，几乎连续不断，包含遗物丰富；阴面（北面）的生活堆积则比较稀少，断崖上可见东西方向的竖穴土坑墓。第五至第八台地面积逐渐减小，灰坑、灰层不多，主要为墓葬分布区。

雷神庙台地较重要的遗迹现象是夯土建筑基址、车马坑（或马坑？）和陶水管道。

夯土建筑基址（49、50号）位于第二台地，仅存地下基础部分，南北向暴露夯土长约18米，厚1.6米，上部被灰坑打破。近旁1.5米处另有一道东西走向、宽0.75米的夯土墙基（48号），与前者似属于同一建筑。

车马坑位于第六台地（71号），南北向暴露6米，南端有一宽0.5米的夯土墙。此坑已遭盗掘，断面暴露大量马骨。据知情者介绍，盗掘时出土了大量漆皮和小件铜器，可能是一座车马坑。

陶水管道位于第三台地（40号），西北—东南走向，与其上叠压的城墙夯土方向大致垂直，埋藏倾角约40°。管道已被盗扰，未被扰动的只保存了一节多。单节管道长80厘米，口径一端粗（25.5~26厘米）而另一端细（18.5~19厘米），近细端外表有一圈凸棱，左右有两个角状横突。连接时粗端在上，细端套入下一节的粗端，凸棱抵住套口，角状横突插入土中固定。在已复原的两节管道上，都发现有刻画记号（图版一〇）。此管道应是从城内向城外排水的设施。

（2）城外

A. 刘家沟区

刘家沟是西山北面一条东西走向的深广大沟，两岸基岩裸露，沟底有季节性水流。遗址位于刘家沟南岸、西山北侧的山梁之下（北城墙在山梁上）。这里的地形东西狭长，面积约4万平方米。

此区由于僻处山阴，地势不够开阔平坦，以往历次调查都未涉足，但这里却是雷神庙台地之外西山遗址另一堆积最为丰富的区域。在一条长达250米的断崖上，包含物丰富的灰坑比比皆是，文化层厚度超过了1.5米。

刘家沟区值得注意的遗迹有三类。其一为形状规整的小型袋状灰坑，皆坑口较小、坑壁光滑，在本区高处分布较多，雷神庙台地则未见。其二为南北向的竖穴土坑小墓，如97号墓，断崖上可见东西宽0.8米。另如被盗的85号墓，采集到人骨和寺洼文化素面鬲足。其三为陶水管道，从陡坎剖面可以看出，水管南北走向，水平埋设在一条0.7

米宽打破生土的沟中。附近未发现建筑迹象，这应该也是城址排水系统的遗迹。

B. 鸾亭山山腰区

遗址位于刘家沟北岸的鸾亭山山腰，西侧有山上泉水冲出的深沟，山顶即为2004年发掘的汉代祭祀地点。这里原为北高南低的狭长缓坡，现被整改为多级台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较高的几级台地面积较小，剖面上暴露出夯土墙体和少量灰坑。最低的两级台地平坦开阔，地表盗洞密布，可见马掌骨及沾染铜锈的马白齿，我们还从被盗墓葬的乱土中采集到陶甗和仿铜陶鬲的残片。由于紧邻西山城址，该遗址与城址年代大致同时。与大量墓葬共存的还有夯土建筑基址，因此，此处遗址的性质值得注意。

C. 大、小雪坪区

大、小雪坪位于城址南面的缓坡，这里的地形平坦开阔，但除了墓葬之外，其他遗迹十分稀少。在小雪坪东部紧邻雷神庙台地处，几座墓葬由于取土被破坏（60~64号墓），出土了成组的寺洼文化陶器。除此之外的大部分区域，根据几处盗掘活动留下的信息，墓葬年代似皆偏晚，不少已属战国甚至汉代。

（三）遗物

本次调查采集的遗物以陶器为大宗，还有石刀（图八：8）、斧（图八：9）、璜（图八：7）等少量石器，以及箭镞、鹿角（图八：6）等骨角制品。下面重点介绍一下陶器。

1. 秦文化陶器

有泥制、夹砂两类。皆手制成形，未见快轮拉坯者。烧成火候普遍较高，陶色绝大多数为浅灰、深灰，少数为黑色、黄色。器类有鬲、甗、三足瓮、釜（以上夹砂）和盆、豆、罐（以上泥制）等。

鬲

标本 X25:2，灰色，侈口，折沿，方唇，绳纹散乱。外口径26.6厘米（图六：1）。

标本 X79:1，灰色，侈口，宽卷沿，沿面内外有两道浅槽，尖圆唇（图六：4）。

标本 X56:4，灰色，侈口，沿微折，沿面内侧有一道浅槽，尖圆唇。外口径34厘米（图六：12）。

标本 X80:1，灰色，侈口，圆折沿，沿面内侧有一道浅槽，圆肩。器身饰中绳纹，裆底为粗绳纹，三面裆上正中的绳纹抹去。外口径19、通高21厘米（图五：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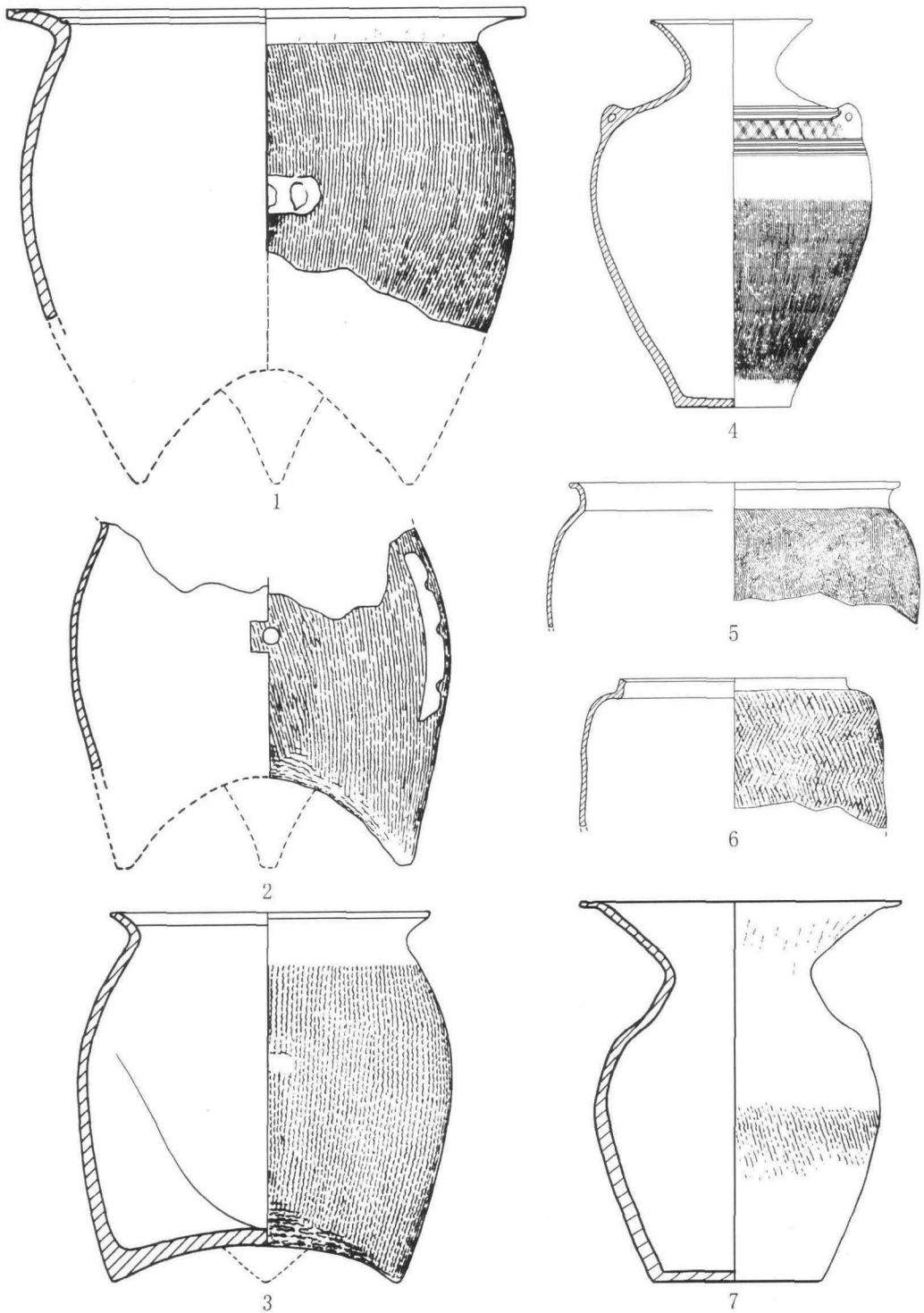
标本 X47:1，浅灰色，侈口，窄沿，鼓肩。外口径32.8厘米（图六：11）。

标本 X53:2，窄沿，短颈，鼓肩，口下为交错绳纹。外口径39.2厘米（图五：5）。

标本 X45:1，直口，鼓肩，口下为交错绳纹。口径26.8厘米（图五：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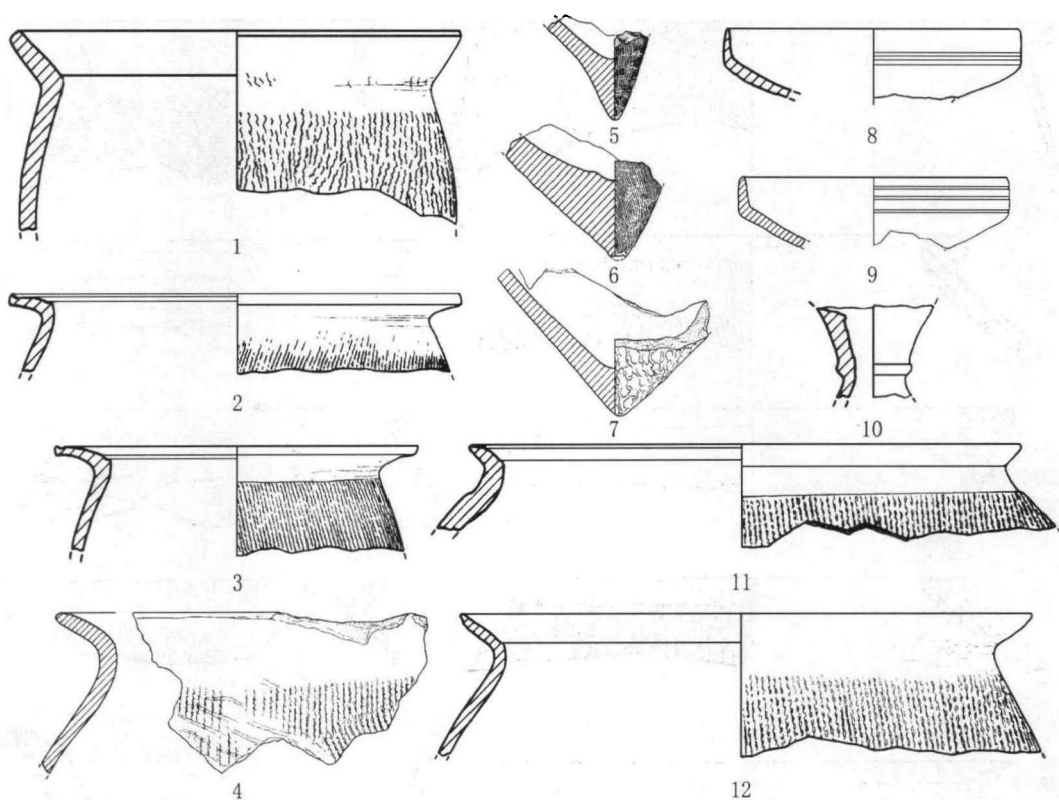
标本 X83:2，深灰色，折沿方唇，沿面有两道清晰的凹槽，器身饰细绳纹。外口径26.6厘米（图六：2）。

标本 X75:1，深灰色，折沿方唇，沿面有两道清晰的凹槽。器身饰细绳纹，裆上正



图五 西山遗址采集的秦文化陶器

1~3、5、6. 鬲 (X75:1、X163:1、X80:1、X53:2、X45:1) 4、7. 罐 (X75:2、X69:1)
(1~3、7为1/4, 4~6为1/8)



图六 西山遗址采集的秦文化陶器

1~7、11、12. 鬲 (X25:2、X83:2、X164:2、X79:1、X81:2、X81:1、X56:5、X47:1、X56:4)

8~10. 豆 (X163:2、X81:3、X165:1) (均为1/4)

中有鸡冠鬲。外口径30.8厘米(图五:1)。

标本X164:2,深灰色,折沿方唇,沿面有两道清晰的凹槽,器身饰细绳纹。外口径21.4厘米(图六:3)。

标本X163:1,仿铜鬲。浅灰色,器身为细绳纹,饰扉棱和泥钉。残高19厘米(图五:2)。

鬲足 标本X81:1(图六:6)、X81:2(图六:5),尖锥状,饰细绳纹。标本X56:5(图六:7),钝尖锥状,饰粗绳纹。

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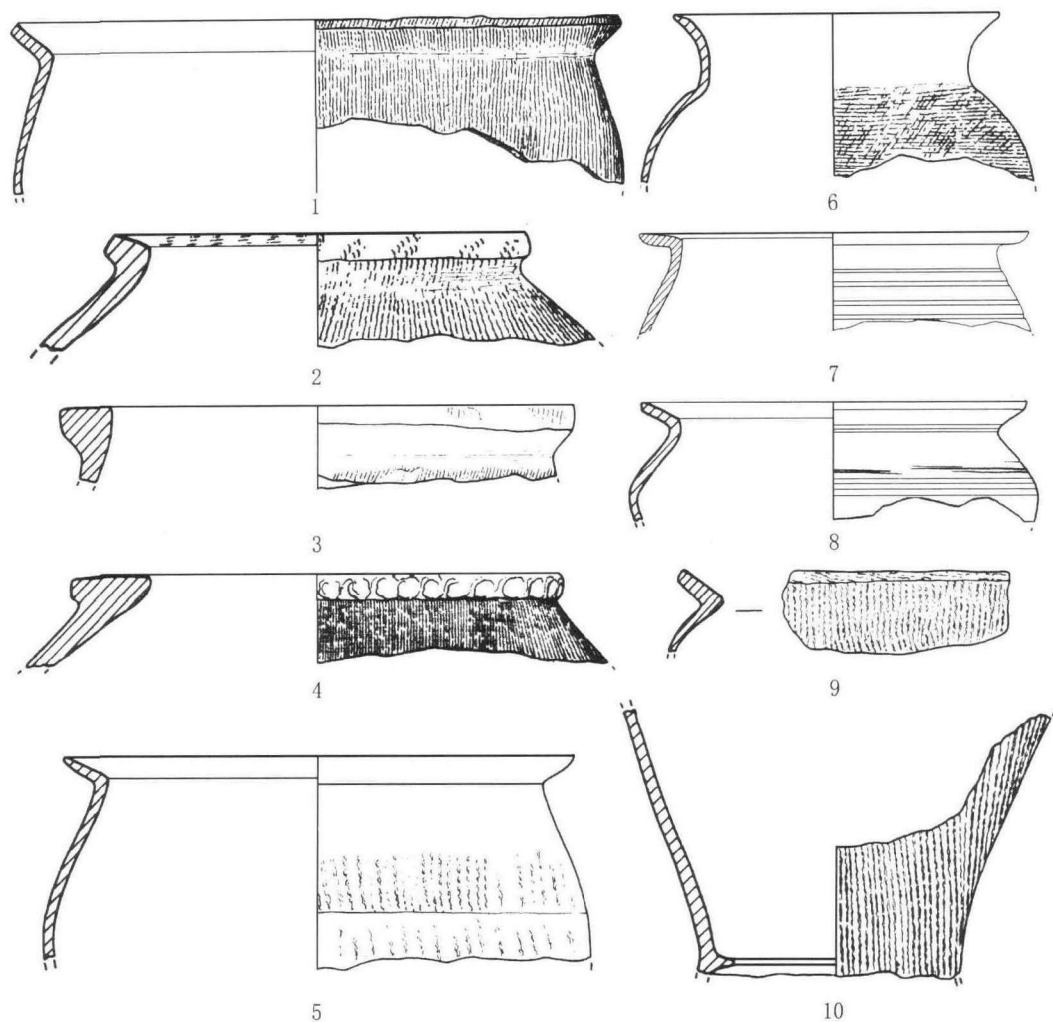
标本X91:1,灰色,侈口方唇,唇缘有斜向绳纹(图七:9)。

标本X164:1,浅灰色,侈口方唇,唇缘有斜向绳纹。口径35.2厘米(图七:1)。

标本X80:2,甗腰残片,深腹斜直(图七:10)。

三足瓮

标本X106:3,深灰色,厚方唇,外口径36.4厘米(图七:2)。



图七 西山遗址采集的秦文化陶器

1、9、10. 甗 (X164:1、X91:1、X80:2) 2~4. 三足瓮 (X106:3、X53:1、X56:2) 5、7、8. 盆 (X56:1、X52:1、X43:1) 6. 釜 (X51:1) (2为1/6, 余为1/4)

标本 X53:1, 浅灰色, 厚方唇, 内口径 30 厘米 (图七:3)。

标本 X56:2, 浅灰色, 敛口叠唇, 唇缘按坑窝纹。内口径 28.8 厘米 (图七:4)。

釜 标本 X51:1, 侈口卷沿, 圆腹, 腹拍印斜向绳纹。外口径 19 厘米 (图七:6)。

盆

标本 X52:1, 深灰色, 平折沿, 沿面有两道凹槽, 尖圆唇, 折腹。上腹磨光, 有数道弦纹。外口径 22.8 厘米 (图七:7)。

标本 X43:1, 深灰色, 折沿, 沿面内外有两道凹槽, 折腹。上腹磨光, 有数道弦纹。外口径 22.6 厘米 (图七:8)。

标本 X56:1, 浅灰色, 折沿, 圆弧腹。上腹抹平, 有未抹净的绳纹痕迹。外口径 30 厘米 (图七:5)。

豆

标本 X81:3, 灰色, 尖圆唇, 盘外有 3 道清晰的弦纹。口径 15.7 厘米 (图六:9)。

标本 X163:2, 浅灰色, 口微敛, 尖圆唇, 盘外有 3 道清晰的弦纹。口径 17 厘米 (图六:8)。

标本 X165:1, 豆柄残片, 有凸棱 (图六:10)。

罐

标本 X75:2, 敞口, 广肩, 斜直腹, 体瘦高。肩上饰篦纹和弦纹, 下腹饰细绳纹。口径 19、通高 46.2 厘米 (图五:4)。

标本 X69:1, 大敞口, 溜肩, 斜直腹。口下有未抹净的绳纹痕迹, 下腹饰绳纹。口径 19、通高 21.4 厘米 (图五:7)。

纺轮 标本 X106:2, 灰色, 泥制, 底面平, 圆弧形顶面上有多道弦纹, 直径 5.8、孔径 0.9 厘米 (图八:4)。

2. 寺洼文化陶器

有泥质和加麝和料的两类。麝和料有粗砂和陶末。皆为手制, 器形常不规整。烧成火候普遍较低, 陶色有黑、灰、棕、橙黄, 常斑驳不纯。器类有鬲、豆、簋、罐等。

罐

标本 X78:1, 黑色, 烧成火候低, 夹粗砂, 敞口, 颈上有罍 (图八:2)。

标本 X84:1, 灰色, 烧成火候低, 敛口, 双耳。口径 9 厘米 (图八:1)。

标本 X61:1, 双马鞍口, 双耳, 棕黄色, 斑驳不纯。通高 20.9 厘米 (图八:10)。

标本 X61:2, 长颈, 棕黑色, 颈上装饰压印的圆点和三角折线。口径 12、通高 21 厘米 (图八:3)。

鬲足 标本 X107:3, 灰色, 素面, 夹粗砂 (图八: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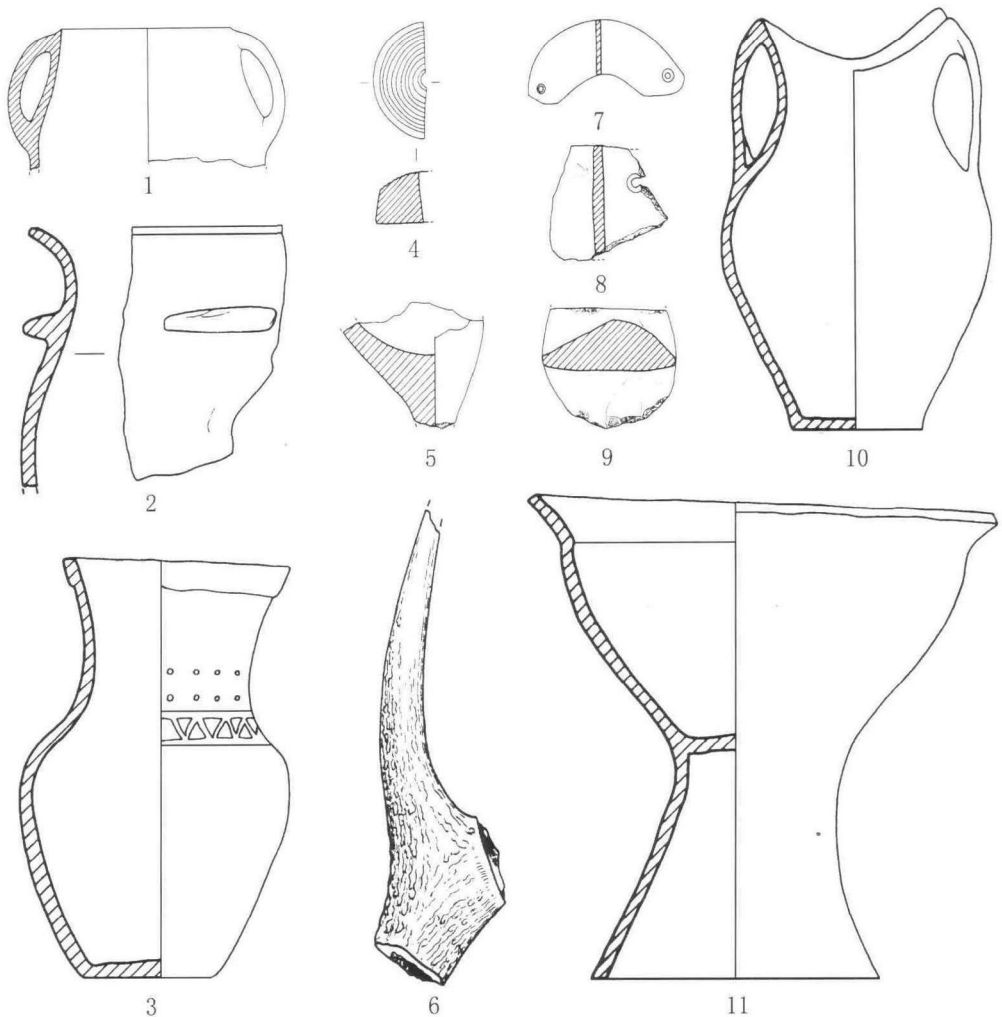
簋 标本 X61:3, 棕黑色, 斑驳不纯。口径 25、通高 24.1 厘米 (图八:11)。

(四) 小结

1. 在我们采集的大量遗物中, 西周中期的遗物较少, 西周晚期至战国早期各阶段的遗物, 在雷神庙和刘家沟两个主要居址区都比较丰富。目前可以认为, 秦文化出现在西山遗址的时间约为西周中期。

西山城址的始建年代尚不明确, 但城墙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已遭毁弃, 故其建造和使用时间进入西周应没有太大疑问。

大量春秋早期之后的遗物表明, 城墙毁后, 西山仍有人继续居住, 并未彻底废弃。但据已掌握的情况, 鸾亭山山腰 (城外) 和雷神庙较高台地的墓葬年代可至西周晚期,



图八 西山遗址采集的秦文化、寺洼文化遗物

1~3、10. 陶罐 (X84:1、X78:1、X61:2、X61:1) 4. 陶纺轮 (X106:2) 5. 陶鬲足 (X107:3) 6. 鹿角 (X103:1) 7. 石镞 (X25:1) 8. 石刀 (X107:6) 9. 石斧 (X44:1) 11. 陶筐 (X61:3) (均为1/4)

属于城址的使用时期，其中不乏等级较高者。雷神庙较低台地（城内）的墓葬多为春秋中期以后的小型秦墓，其时城址已经废弃。由城址废弃前后墓地的变化来看，西山聚落的地位可能有所降低。

2. 西山城址像同时期其他遗址一样位于山上，这可能是由当时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城址位置没有选择开阔平坦的大、小雪坪，而是更加靠近刘家沟的泉水；城墙不仅围绕平缓的雷神庙台地，而且圈进了陡峻的西山山梁，这应是出于防御的考虑；许多难以攀登的地段看似没有筑墙的必要，却都发现了城墙遗迹，不存在以往设想的堑山为城的情况，这应与文化传统有关。由上述几点看来，水源、防御和文化传统是影响选

址布局的主要因素，相比之下，地形条件还在其次。

西山城址的形状很不规则，内外同时有几处分离的居住区和墓地，每处居址的面积都不是很大，在有些陡峭的地方，发现的普通居住遗迹规模似乎很小。这都是受地形限制的缘故，也构成了山城的显著特色。

3. 西山遗址有较多的寺洼文化遗物，除了墓葬之外，它们都与秦文化的遗物共存于同一单位（参见附表一），目前看来，两者同时的可能性很大。这种现象在2004年发掘鸾亭山山顶的西周中期小型居住点时已经发现，经统计，那里的两种文化陶片比例基本平分秋色，当时我们曾怀疑为寺洼文化人群的居址。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雷神庙居址区的寺洼文化陶片很少，而刘家沟区的灰坑中则很常见，结合两区发现的不同类型墓葬，有理由推测，两种文化的主人在西山是分区居住的。根据2004年的流域调查，西汉水中下游河谷渐窄，主要为寺洼文化的分布区，少量的周代遗址均年代偏晚。西汉水上游则主要为周代文化的分布区，寺洼文化遗址十分稀少。西山遗址的位置正处在两种文化势力的交汇地带，在此发现一座城址，且有两种文化共存，应该不是偶然的。据文献记载，与早期秦人发生密切关系的主要是戎人。学界普遍认为，寺洼文化即为戎人的考古学文化，西山遗址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背景是相对应的。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所见最早打破城墙的灰坑为袋状，位于刘家沟居址区上方的北城墙西段（31号灰坑）。此坑及附近灰坑都包含寺洼文化陶片，共存的周秦系统遗物属于西周晚期。这种与城墙毁弃有关的现象非常值得注意。

总之，西山城址是我们在西汉水上游秦人故地确认的第一座城址。尽管两千多年山地的水土流失和近世的平田整地、人为盗掘使遗址遭受了严重破坏，但通过今后细致的工作，相信存留下来的信息仍有助于我们认识秦人早期的发展状况。

二、大堡子山城址

（一）位置

大堡子山遗址位于礼县永兴乡与永坪乡交界处的西汉水北岸，西距县城13公里，直线距离约9公里，因山上有清代城堡得名。遗址所在的黄土塬西临西汉水支流永平河河谷，南与山坪遗址相对，东、南俯瞰西汉水川地，平均高出河床约100米。

大堡子山以东20余公里的河谷是西汉水上游最开阔的地段，以西约10公里的河谷狭窄蜿蜒，两岸山势陡峭，直至县城附近才又逐渐开阔。大堡子山与对岸的山坪直线距离只有120米左右，形成一个急剧收束的峡口，地势十分险要（图版一一）。

（二）以往工作与发现经过

大堡子山遗址受到重视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盗墓风潮。199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清理了两座被盗的中字形大墓、一座车马坑和9座中小型墓葬。根据此前流散的有铭铜器，学界普遍认为，这里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秦公陵园〔6〕。1998年、2000年，礼县博物馆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大堡子山东南相距3公里的圆顶山抢救发掘了4座春秋贵族墓葬和1座车马坑〔7〕。2002年，上述单位在大堡子山调查时，发现了一道断续的夯土墙，即后来的北城墙。2004年春，早期秦文化课题组也在此进行了踏查、采集。由于以往的成见，两次工作都认为，这段墙体只是大墓与中小墓的分隔，亦即秦公陵园的陵墙。

2006年度的工作开始以前，我们总结西山遗址调查的经验，考虑既然西山遗址存在城址，那么，已显示高等级迹象的大堡子山、圆顶山遗址很可能也存在城址。4月初，调查人员带着希望首先开始调查圆顶山遗址，但由于客观原因，工作只进行了一天，未取得期待中的发现。

随后进行的大堡子山遗址调查很快就取得了进展。我们沿着已知的夯土墙寻找，在距其东南尽头不远处，发现了另一段与之方向垂直的墙体，这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我们用了不长的时间，即在相距很远的几个地点发现了夯土墙残迹，并通过细致调查，在夯土墙圈起的范围内，发现了被山体分开的两片居址及多处夯土建筑基址，最终确认了城址的存在（图九）。

需要说明的是，大堡子山城址的城墙多修建于山体的边缘，许多地段塌毁严重，保存下来的也多陡峭难以涉足，调查难度较大。此项工作断续进行了很长时间，直到不久前的最新发现，才使城址轮廓比较清晰〔8〕。

（三）遗迹

大堡子山遗址主要包括城址和北城墙外的墓地，另在西城墙外发现有少量灰坑、墓葬（图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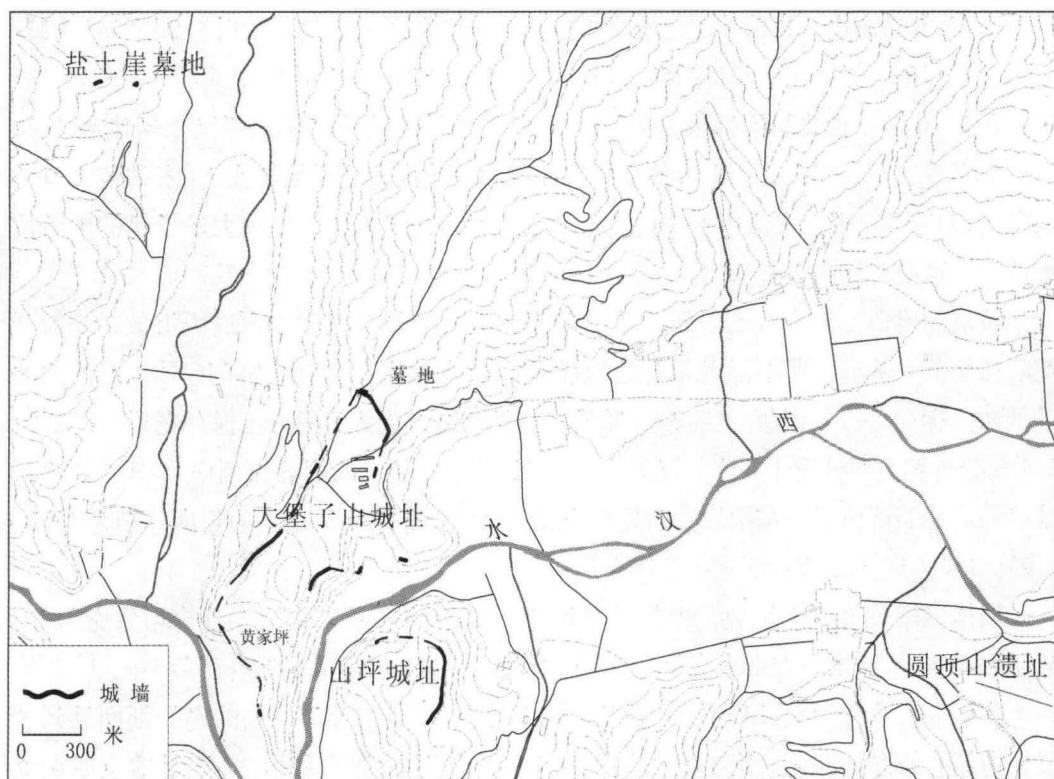
1. 城址

城址坐落在东北—西南走向的山体上，围绕整座大堡子山而建，形状很不规则。北城墙的长度约250米，西城墙复原长度1300米。南城墙和东城墙只发现了数段，均位于山体边缘、紧邻断崖的地方，根据这一规律，估计原长度分别为870和2600米。城址总面积约55万平方米。

〔6〕 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

〔7〕 a.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礼县博物馆《礼县圆顶山春秋秦墓》，《文物》2002年第2期；b. 《甘肃礼县圆顶山98LDM2、2000LDM4春秋秦墓》，《文物》2005年第2期。

〔8〕 此前报道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一文中，关于城址部分以本报告为准，见国家文物局主编《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74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图九 大堡子山遗址群

海拔 1620 米的大堡子所在高地将城址分隔为两部分。高地东北至城址西北角（海拔 1605 米）之间的鞍部，为城内面积最大的平缓区域。高地西南三面环山的箕形地带（海拔 1520 ~ 1470 米）为较平缓的坡地，当地人称黄家坪。自大堡子山顶降至最低处的城墙，落差达 165 米。

城墙的保存现状以北墙最为完整，虽在平田整地时被切为 9 段，每段一般只在梯田前端保留数米，但所幸西北、东南两个转角尚存，且在一个断面上保存了 6.9 米的完整宽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城墙西北端恰建于山脊地势较高的土丘上（高程仅次于大堡子山顶），这里的夯土宽度远超出南北与之连接的城墙，形成一个东西宽 20、南北长 40、现存高度 5 ~ 6 米的长方形大夯土台（图版一二:1）。据当地群众反映，此夯土台在平田整地前还要高出十余米。即使现在自数公里外观之仍颇为显著。

西城墙的状况仅次于北墙，它的北段由于山体大面积滑坡已经无存。中段的地形变化稍小，见到随山体滑落的夯土 20 余米（247 ~ 248 号）。南段地形没有大的变动，城墙保存也最好，长度约 260 米（111 ~ 249 号），厚度尚存 3 米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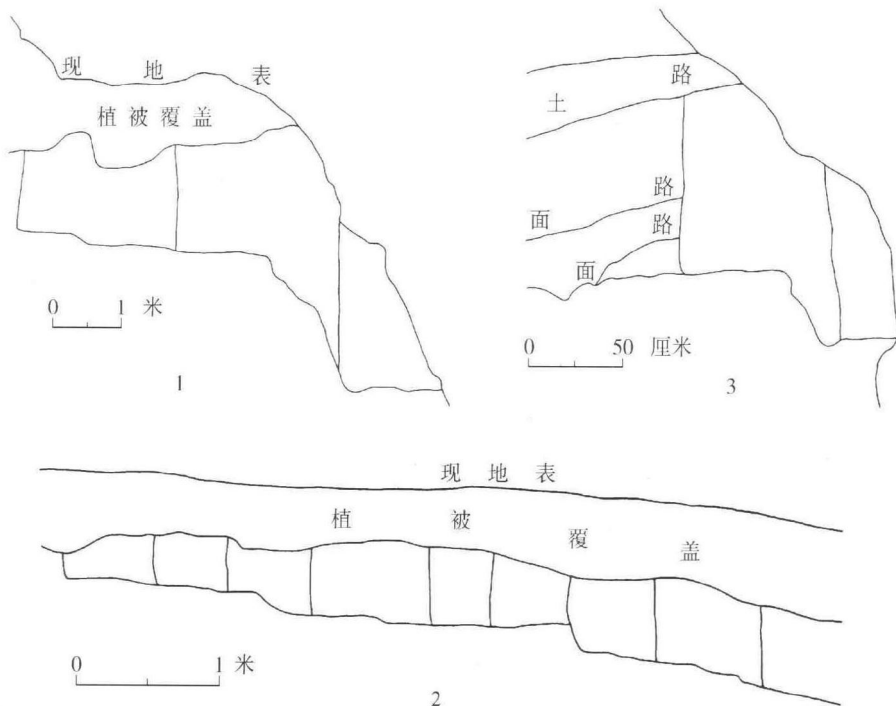
南城墙和东城墙的保存状况最差。南墙只发现了两段，一段露出数米（130 号），位于黄家坪西侧的山脊上；另一段保存 19 米（113 ~ 114 号），位于黄家坪正南，高出

西汉水 35 米的崖边, 目前情况已岌岌可危。东城墙发现了 5 段, 分别长 50 (245~252 号)、38 (250~251 号)、31 (157~158 号)、28 (159~162 号) 米, 最长的一段 143 米, 宽 5~6 米。自北起第四段是目前所见高程最低的城墙, 仅比西汉水河床高出 20 米, 它直接建在基岩上面, 上方的山势坡度很大。城内比这段墙体高 10 米的地方有一泉眼 (131 号), 现今水流不大, 但经年不息。据当地老人讲, 以前大堡子里的生活用水就取自这里, 靠人力背上山。

城墙的建造方法为夯土版筑, 情况与西山城址类似, 宽度亦由三版组成, 一般开挖阶梯状的半基槽, 所不同者是有的地段直接起建于基岩之上。如 246 号地点的北墙横剖面 (图一〇:1; 图版一二:2), 基槽分高低两级, 内侧两版夯土保存完整, 宽 2.2、2.4 米, 外侧一版残宽 1.6 米。又如 111~112 号地点显示的西墙纵剖面 (图一〇:2), 城墙顺山势北高南低, 基槽底面两处有明显的台阶, 连续几版夯土的长度分别为 1.25、1.05、1.3、1、1.2 米。

墙体多用黄色生土筑成, 少数地段取用了原有的齐家文化层, 结构均致密坚硬。夯层厚 4.5~7 厘米, 夯窝为直径 3.2~4、深 0.5~0.8 厘米的圆形 (图版一三:1)。

我们在北墙 (245、249 号)、西墙 (112 号)、南墙 (157 号) 的多处剖面见到了墙根内侧有较厚的路土, 有的地方厚达 0.5 米。如图一〇:3 所示, 245 号地点的南墙横剖面, 墙根下的路土呈缓坡状, 较纯净, 厚 0.38 米。这种路土应是城墙在使用时期



图一〇 大堡子山城址城墙剖面图

墙内普遍有道路的反映。此外，245号地点残高1.3米的墙体上，还叠压着一层更厚的路土，这应该是墙体废弃以后形成的。

目前所见城墙下的少数遗迹单位均属齐家文化时期。在夯土内包含的少量陶片中，可辨识的有约属西周晚期的陶盆口沿、粗绳纹鬲足，由此可知，城墙的始建年代不会早于西周晚期。在西墙上的112号地点，残高1.5米的墙根内侧有0.5米厚的路土，其上叠压着两个包含物稀少的文化层。一个春秋晚期的灰坑打破了此文化层，现存坑口高于路土底面2.8米。由此判断，城墙在春秋晚期之前一段时间已经废弃。

2. 城内外的遗迹（图一一）

（1）城内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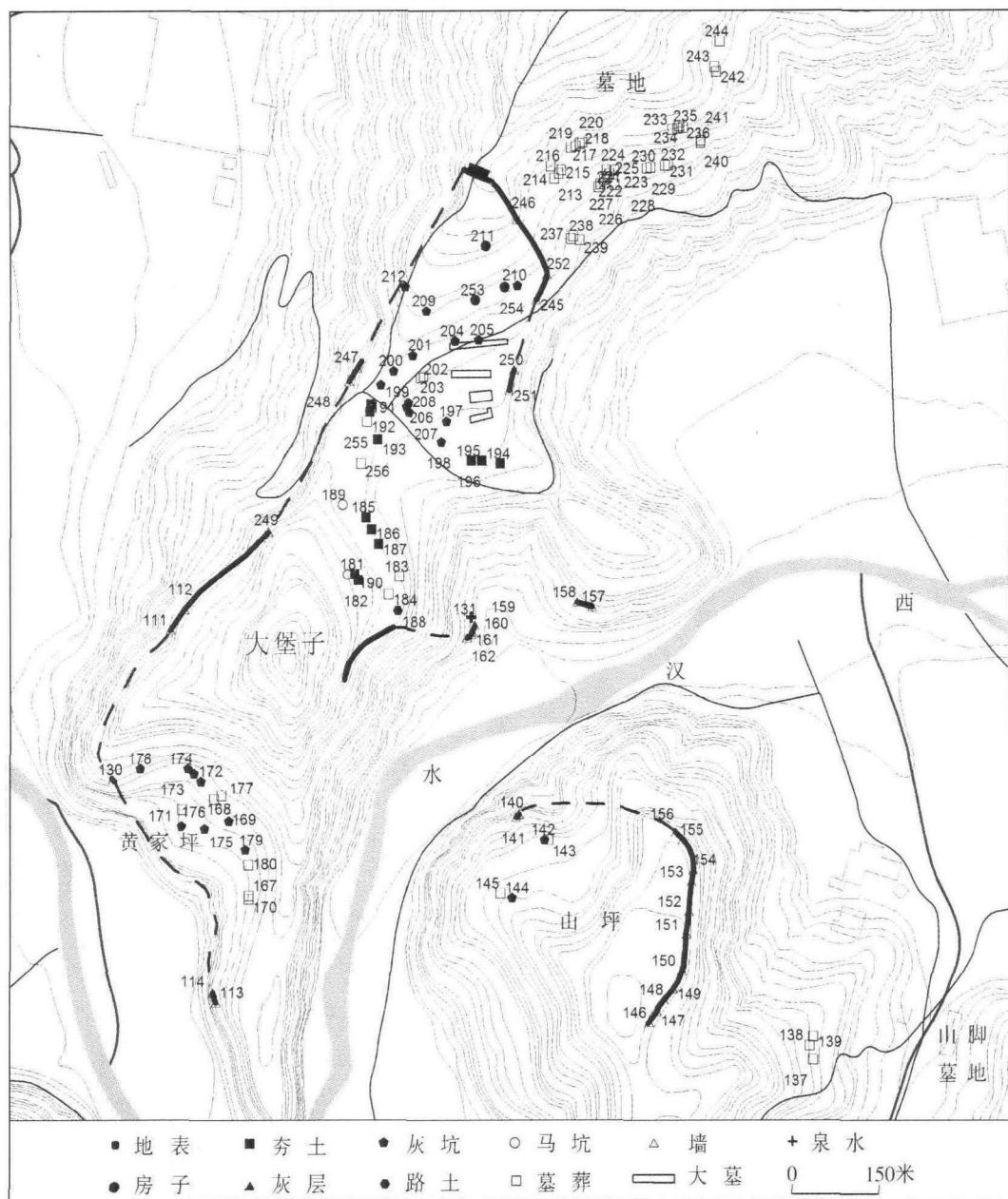
主要位于前述两块地势较平缓的区域，中间的大堡子高地周边及顶部地表有零星周代陶片，但没有发现遗迹。城内大堡子山东北部分的面积约有23万平方米，解放后修建的老公路在正中南北穿过。这里的地形原为缓坡，现已被整改成十余级梯田。公路以南的地形变化较大，陡坎少而高，观察到的遗迹也较少；公路以北秦公大墓附近7万平方米左右的范围，遗迹则比较集中。在此区域的中心，自北而南分布着“中”字形大墓M3、M2，车马坑K1及另一座未清理的大型车马坑。它们的东面30~40米即为东城墙，西面和北面的断崖上，可见一些灰坑和小型墓葬（图一一、附表一）。值得注意的是，M3北面150米长的陡坎上灰坑比较密集，似为生活区域，M3的西墓道北壁还被一大灰坑打破（204、205号）。

夯土基址的分布目前还看不出规律，在两座大墓之间、大墓的南北、老公路以南都有发现。例如，未发掘车马坑以南一道东西向矮坎上暴露出两块夯土（194~196号），分别长10、28米，似为两座面向南的建筑。在老公路以南的一道陡坎上，露出一座尚存地面的房子（191、192号），有两道东北—西南走向的夯土墙，分别宽2.5、1.3米，墙间距离11.2米，似为一座面向东南的建筑。在同一道陡坎向南190米处，又露出一座南北总长54米的建筑基址（185~187号），其中夯土露出两段，夯层清晰，厚7.5~10厘米（图版一三:2），中间没有夯土的段落为人工铺垫的石片、石块层。夯土建筑中有的年代明显偏晚，例如M3以北的一些小型基址（211、253、254号）。在211号附近地表发现大量瓦砾，可见葵纹瓦当、菱形纹地砖等，约属秦汉时期。

大堡子山之西南的黄家坪面积约有7万平方米，地形原为坡地，现亦为梯田。这里地表陶片较多，发现鬲足、盆、盂、豆、罐等。断面上所见遗迹主要是灰坑和东西向的中小型墓葬，一座被盗墓葬的附近地表见有马骨和薄铜片。

（2）城外墓地

位于北城墙外的山坡上（海拔1535~1595米），占地面积约9万平方米。断面上可见墓葬的分布密集有序，墓向东西而略偏北，估计总数不下三、四百座。



图一— 大堡子和山坪城址调查遗迹

所见墓葬绝大多数为3~5米长的中小墓，大者墓长可达7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堡子山的盗墓活动从这里开始，逐渐向城内蔓延。盗掘对墓地的破坏相当严重，许多墓葬被“大开挖”，墓内填土悉被掏出，几面墓壁至今都清晰可见。据了解，当年此墓地几座较大的墓葬中，都被盗出了成组的青铜礼器。

(四) 遗物

采集的遗物以陶器为大宗，另有少量石器、骨器。

1. 石器、骨器

石刀 标本 D:6, 刃钝厚, 两面管钻, 器表有磨制时留下的斜向擦痕。高 4.5、残宽 7 厘米 (图一四:7)。标本 D:34, 刃钝厚, 两面管钻。高 5.5、残宽 7.6 厘米 (图一四:2)。

石斧 标本 D:4, 磨制, 双面刃, 一面有崩损。高 9、宽 2.7 厘米 (图一四:10)。

骨镞 标本 D:5 三棱锥形, 圆铤。长 5 厘米 (图一四:8)。

2. 陶器

分为陶质特色明显不同的两类。一类为常见的周秦系统陶器, 以绳纹灰陶为特征, 器类有鬲、甗、三足瓮、釜 (以上夹砂) 和盆、孟、豆、罐 (以上泥制) 等。另一类较少见, 但特征明显, 器表皆平整素面, 陶色为斑驳不纯的橙黄色、黑色, 烧成火候较高, 器类目前见有罐和大袋足铲足根鬲。

(1) 秦文化陶器

鬲

标本 D:24, 浅灰色, 侈口, 宽卷沿, 沿面内外有两道凹槽, 尖圆唇。外口径 34.2 厘米 (图一二:4)。

标本 D:26, 浅灰色, 侈口, 卷沿, 沿面宽度中等, 上有两道凹槽, 尖圆唇。外口径 20.2 厘米 (图一二:7)。

标本 D:30, 浅灰色, 侈口, 窄卷沿, 沿内有一道凹槽, 尖圆唇。外口径 22.4 厘米 (图一二:8)。

标本 D:18, 浅灰色, 侈口, 窄沿圆折。外口径 29.4 厘米 (图一二:1)。

标本 D:21, 深灰色, 小平折沿, 短直颈, 鼓肩。外口径 26 厘米 (图一二:2)。

标本 D:29, 浅灰色, 敛口无沿, 沿下拍印交错绳纹。外口径 25.2 厘米 (图一二: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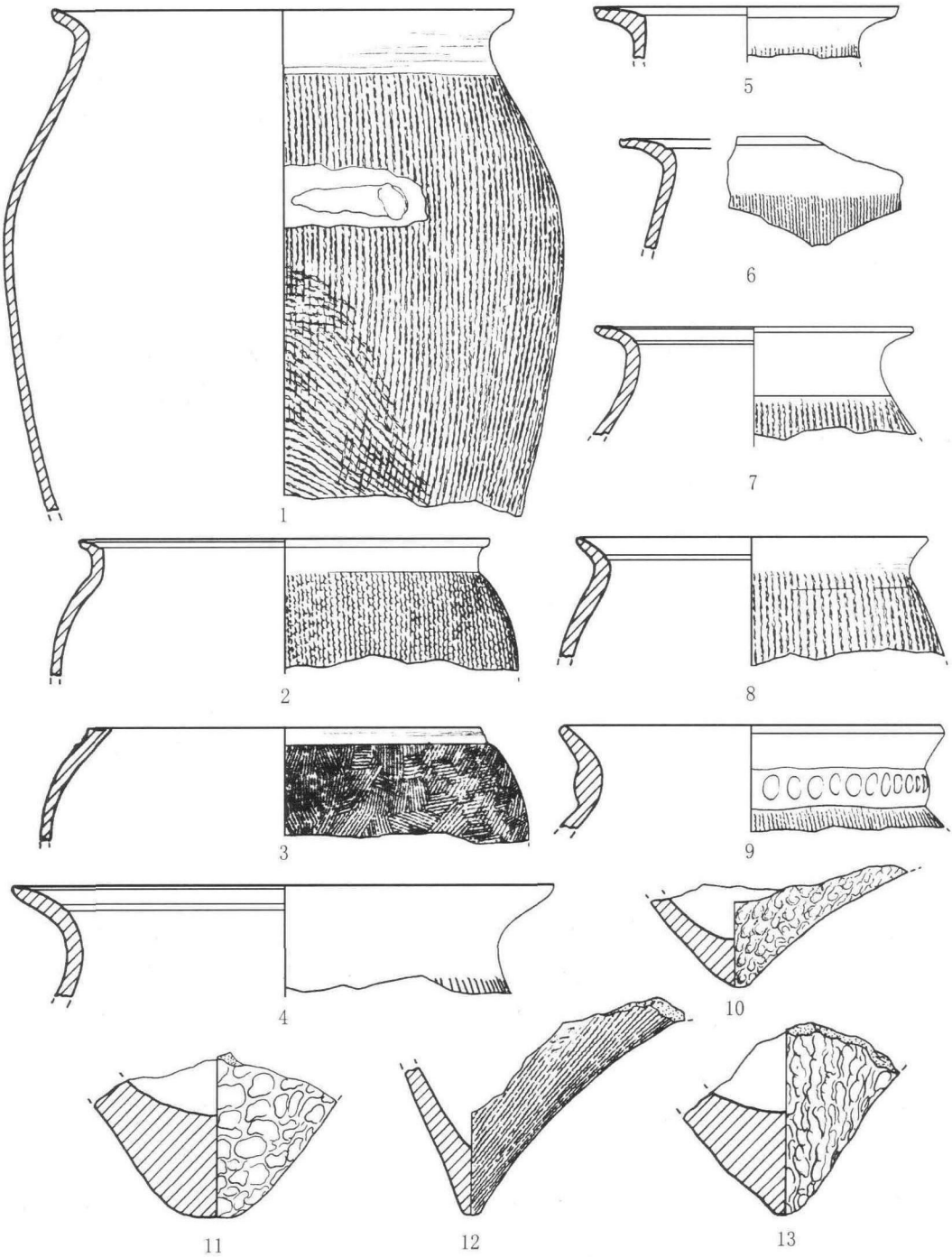
标本 D:28, 深灰色, 侈口, 卷沿, 方唇, 口下饰一周附加堆纹。外口径 24.4 厘米 (图一二:9)。

标本 D:10, 深灰色, 侈口, 平折沿, 沿面内外有两道清晰的凹槽, 方唇。外口径 19.2 厘米 (图一二:5)。

标本 D:2, 深灰色, 侈口, 折沿, 沿面内外有两道清晰的凹槽, 方唇。器身拍印细绳纹 (图一二:6)。

鬲足

标本 D:11, 尖锥状足, 细绳纹 (图一二:12)。标本 D:31, 锥状足, 粗绳纹 (图一二:13)。标本 D:19, 钝锥状足, 下腹拍印交错绳纹, 裆底戳印浅麻点凹坑 (图一二:10)。标本 D:20, 足圆钝, 戳印深麻点凹坑 (图一二:11)。



图一二 大堡子山遗址采集的秦文化陶鬲

1. D: 18 2. D: 21 3. D: 29 4. D: 24 5. D: 10 6. D: 2 7. D: 26 8. D: 30 9. D: 28 10. D: 19
11. D: 20 12. D: 11 13. D: 31 (1~10为1/4, 11~13为1/2)

甗 标本 D:36,侈口,方唇,唇缘有细绳纹。口径 40.6 厘米(图一五:1)。

三足瓮

标本 D:17,浅灰色,厚方唇,唇缘和口下、器身的绳纹贯通。外口径 54.6 厘米(图一五:2)。

标本 D:12,扁梯形瓮足,高 3.3 厘米(图一四:9)。

釜 标本 D:9,深灰色,卷沿,方唇,束颈,鼓腹,口下拍印斜向绳纹。口径 12.4 厘米(图一五:4)。

盆

标本 D:27,浅灰色,侈口,折沿,沿面有两道清晰凹槽,尖圆唇,折腹。上腹饰 3 道弦纹,器表磨光。外口径 19.8 厘米(图一三:7)。

标本 D:37,深灰色,侈口,折沿,沿面较宽,上有两道模糊凹槽,上腹抹平。外口径 29 厘米(图一三:3)。

标本 D:35,深灰色,侈口,折沿,沿面较宽,圆腹。上腹抹平,有未抹净的绳纹痕迹,下腹拍印粗绳纹。外口径 35 厘米(图一三:1)。

标本 D:25,浅灰色,侈口,折沿,沿面较窄,尖圆唇,圆腹。器表上腹素面抹平,有未抹净的绳纹痕迹,下腹拍印绳纹。外口径 25.2 厘米(图一三:2)。

标本 D:22,浅灰色,侈口,窄平折沿,短直颈,圆腹。器表素面抹平,有多道轮修痕。外口径 30.6 厘米(图一三:4)。

盂 标本 D:23,浅灰色,小平沿,短直颈,圆腹,器表有数道凸弦纹。外口径 20.6 厘米(图一四:3)。

豆

标本 D:14,浅灰色,尖圆唇,盘外有 3 道整齐的弦纹。口径 19.8 厘米(图一三:5)。

标本 D:1,深灰色,盘外弦纹模糊,细柄。口径 16.6 厘米(图一三:6)。

标本 D:13,豆柄,灰黄色,柄上有一周凸棱(图一四:4)。

罐

标本 D:32,肩部残片,深灰色,广折肩,上下有两组弦纹(图一四:1)。

标本 D:15,罐耳(图一四: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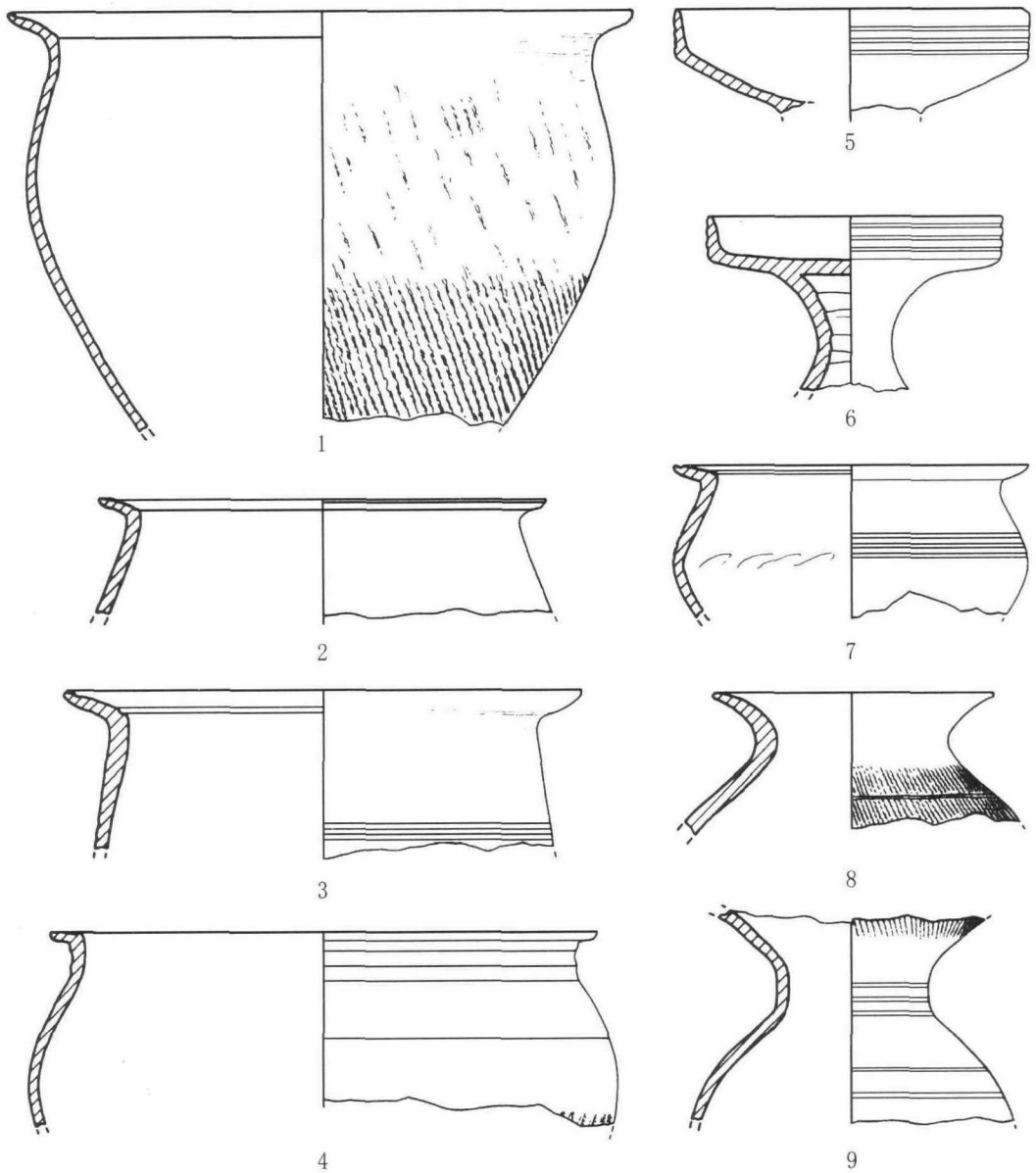
标本 D:16,罐口残片,敞口,口下有未抹净的绳纹痕迹(图一四:5)。

标本 D:3,敞口,直颈,圆肩,口下有未抹净的绳纹痕迹(图一三:9)。

标本 D:33,灰色,侈口束颈,口径 15.7 厘米(图一三:8)。

标本 D:38,大敞口,圆肩,圆腹。颈和肩上有弦纹,口下有未抹净的绳纹痕迹,下腹饰粗绳纹。口径 23 厘米(图一四:12)。

纺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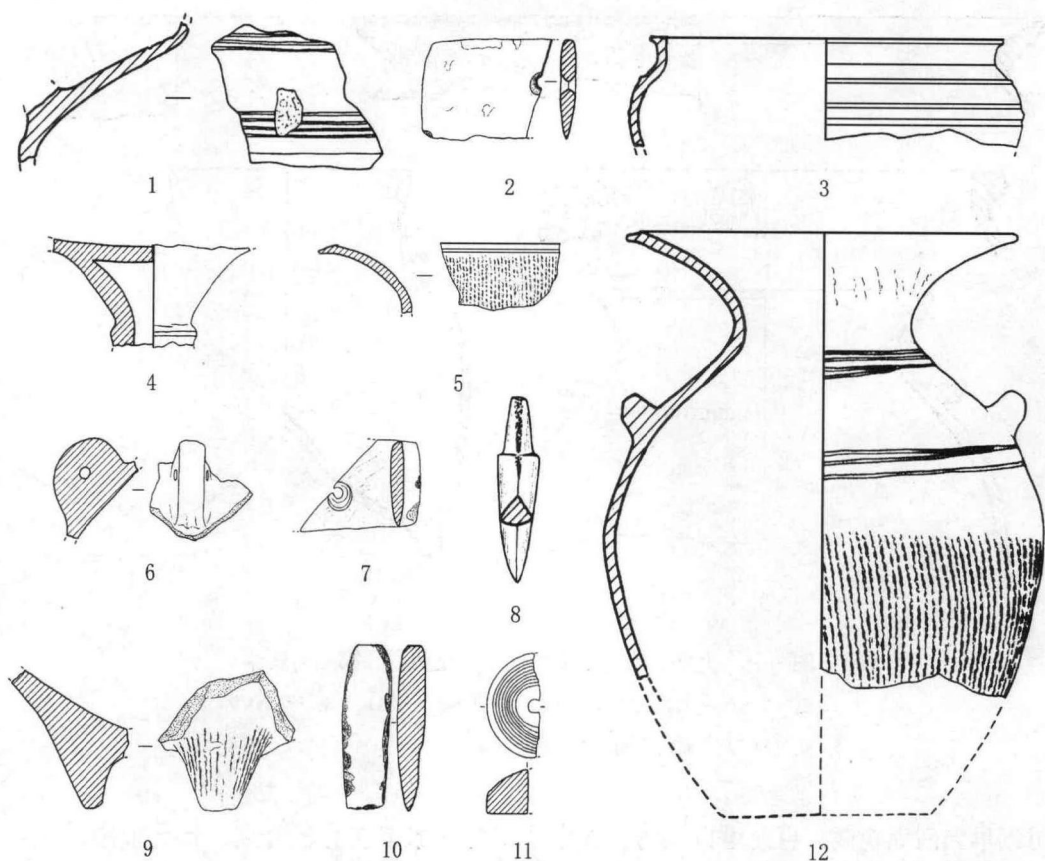
图一三 大堡子山遗址采集的秦文化陶器

1~4、7. 盆 (D:35、D:25、D:37、D:22、D:27) 5、6. 豆 (D:14、D:1)
8、9. 罐 (D:33、D:3) (均为1/4)

标本 D:7, 灰色, 泥制, 底面平, 圆弧形顶面, 上有多道弦纹。直径 5.6、孔径 0.7 厘米 (图一四:11)。

(2) 第二类陶器

罐 标本 D:8, 陶色灰红, 斑驳不纯。侈口方唇, 圆肩, 肩上一整, 附加一条堆纹, 外口径 19.8 厘米 (图一五:3)。



图一四 大堡子山遗址采集的秦文化陶器以及采集的石、骨器

- 1、5、6、12. 陶罐 (D:32、D:16、D:15、D:38) 2、7. 石刀 (D:34、D:6) 3. 陶盂 (D:23)
 4. 陶豆柄 (D:13) 8. 骨镞 (D:5) 9. 陶三足瓮 (D:12) 10. 石斧 (D:4) 11. 陶纺轮 (D:7)
 (8、9为1/2, 余为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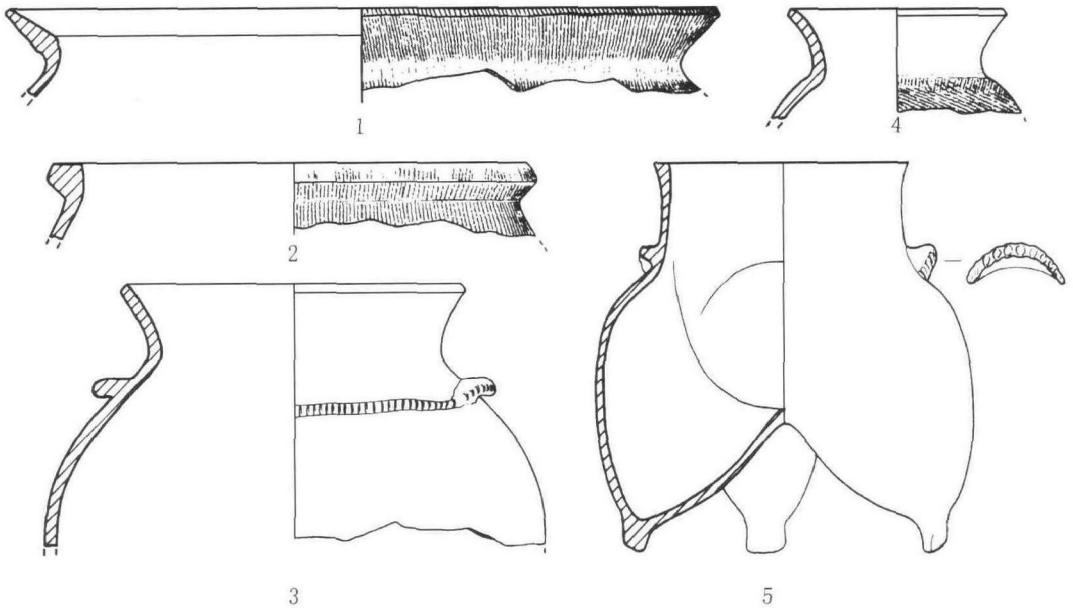
鬲 标本 D:39, 橙黄、黑色, 斑驳不纯。直口, 双鬲, 大袋足, 铲形足根, 通体素面抹平, 体量大。通高 42.8、口径 29 厘米 (图一五:5)。

(五) 小结

1. 学界以往普遍相信, 大堡子山遗址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秦公陵园, 与之相应的都邑遗址应距离不远。通过本次调查可以确认, 大堡子山遗址不是单纯的墓地, 而是一处有夯土城垣、城外墓地、居址区和众多夯土建筑的中心遗址, 而且是目前发现的西汉水上游秦人故地规模最大的城址。

在方圆 3 公里的范围内, 与大堡子山城址同时共存的还有西北方的盐土崖遗址、正南方的山坪城址和东南方的圆顶山遗址 (图九)。这些遗址在春秋早、中期都具有高等级因素, 它们与大堡子山城址一起构成了大堡子山遗址群。

2. 在我们采集的大量遗物中, 春秋至战国早期的遗物数量最多, 只有很少的标本



图一五 大堡子山遗址采集的秦文化陶器和第二类陶器

1. 甗 (D:36) 2. 三足瓮 (D:17) 3. 罐 (D:8) 4. 釜 (D:9)
5. 鬲 (D:39) (2、5为1/8, 余为1/4)

可以早到西周晚期，目前可以认为，大堡子山遗址繁荣在春秋时期，年代上限约为西周晚期。同时，城墙夯土中包含的陶片表明，城址的始建年代不会早于西周晚期；晚于城墙的灰坑证明，城墙最迟在春秋晚期已经废弃。上述只是初步的年代线索，但对理解大堡子山城址的性质以及解决尚存争议的秦公大墓墓主问题无疑会有很大帮助。

3. 大堡子山遗址只见到零星的寺洼文化陶片，与西山遗址的情况有很大不同，这可能有地域和年代两方面的原因。陶质、陶色特征鲜明的第二类陶器，根据与其共存的秦文化陶器来看，年代约在战国时期。这类陶器过去曾发现于甘谷毛家坪遗址（被称为B组遗存），也是与东周时期的秦文化陶器共存^[9]。这次在西汉水上游再次发现这类陶器，它与同时的秦文化以及更早的寺洼文化的关系，都值得今后深入研究。

4. 本次调查有一些新的发现，同时也提出了诸多问题：其一，大堡子山遗址在秦公大墓被盗以前一直没有引起注意，究其原因，与遗址上灰坑、灰层等生活遗迹不很丰富有很大关系，那么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其二，相对最丰富的生活遗迹与秦公大墓处在同一区域，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大墓M3被春秋时期灰坑打破的现象应怎样理解？其三，城址的规模虽然不小，但城垣以内其实有很多地方无法居住

[9]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

(以大堡子高地周边最明显),城址为什么要做如此规划?这些问题都与大堡子山城址的性质相关,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只有今后更加细致的工作才能解决。

三、山坪城址与盐土崖墓地

山坪城址与盐土崖墓地均发现于大堡子山城址调查期间,因时间和人力所限,两处的目前还不够充分,在此一并介绍。

(一) 山坪城址

山坪城址位于西汉水南岸,与大堡子山城址隔河相对(图九)。遗址所在的山下有村庄名“山脚”,山顶的塬面平坦开阔,当地因此名之“山坪”(图版一四:1)。

1. 发现经过

大堡子山城址基本确认后,我们记起《水经注·漾水》在记述西汉水流经盐官、祁山后有如下一段文字:“汉水又西迳南岬北岬中,上下有二城相对,左右坟垅低昂,亘山被阜。古谚云:南岬北岬,万有余家。诸葛亮《表》言:祁山去沮县五百里,有民万户,矚其丘墟,信为殷矣”^[10]。按《玉篇·山部》:“岬,谿岬,山深之状。”《集韵·麻韵》:“岬,谿岬,谷中大空貌,或从山。”“岬”与西汉水流经大堡子山和山坪之间的峡口后河谷狭长幽深的地貌正合,酈道元所记方位也与大堡子山一带相应,因此,他所说的城址废墟与我们已发现的大堡子山城址很可能有直接关系。如果这个推测能够成立,那么附近还应该有一座城址。

4月底,调查人员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涉河至西汉水南岸调查。据当地群众反映,山坪半山腰曾有盗墓活动,我们上山查看,寻找终日却只见到零星陶片。天近傍晚,就在我们准备放弃之时,一堵高大的夯土墙终于进入了视野(图版一四:2)。我们据此线索顺藤摸瓜,很快就找到了两百余米的墙体。次日再度上山,又发现了半山腰的居址区和城外东侧一处寺洼文化墓地。

2. 遗迹

山坪城址的城墙目前只发现了东墙、南墙各一段,尚不能闭合。东墙位于山顶平地的边缘,依陡坡而建,长约390米(146~156号),保存最好的段落高5米,版筑留下的夹版痕迹尚清晰可见。南墙位于半山腰居址的边缘(140、141号),长8米,其下

[10] 从酈道元这段记录我们可以知道,北朝时“南岬北岬”的城址废墟尚清晰可辨,且当地流传着两座古城的传说。同时还应该看到,酈道元把这两座古城误认为三国前后的遗迹(大堡子山和山坪都没有这个时期的遗存,诸葛亮所说的祁山可能在今祁山堡一带,那里有丰富的汉魏时期遗存),显然当时已不清楚两座城的真实年代和性质。由此推论,《水经注》认为先秦的犬丘即汉代西县城,并置于杨廉川(今红河)流域也不一定可靠。

即是60多米高的断崖。上述两段城墙落差90米，连线复原长度约720米（图一一）。墙体多以黄色生土夯筑，包含物很少。夯层较厚，为10~14.5厘米，夯窝直径3~4厘米。所见的连续3版夯土的长度为1.85、1.4、0.9米。

山坪城址内山顶的地形平坦开阔（海拔1590米），面积有8万多平方米，但地表只见零星陶片。遗存相对丰富的区域位于城内西北部半山腰一块箕形的坡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这里的地形未经过大的整改，地表遗物稀少，但因盗掘暴露出一些灰坑和墓葬。采集到的遗物有石刀、圆陶片、陶鬲、陶盆的碎片，另在一座被盗墓葬（143号）内拣到了罐耳残片。

在城外东侧山腰，我们还发现了一处遍布盗洞的寺洼文化墓地，人骨及寺洼文化的陶簋、豆、长颈罐的碎片俯拾皆是。2004年春，课题组曾经在山坪以东、沟对岸的山坡上发现过一处寺洼文化墓地，当时命名为山脚墓地，并认为是西汉水上游寺洼文化最东面的分布点^[11]。

3. 遗物

（1）石器

石刀 标本S:1，利用片状岩石制成，双面管钻。高4.8、宽9厘米（图一七:9）。
标本S:4，刃圆钝。高4.8、残宽5.1厘米（图一七:4）。

（2）陶器

鬲

标本S:9，浅灰色，侈口，折沿。外口径27.4厘米（图一七:1）。

标本S:8，灰色，折沿，沿面内侧有一道浅槽。外口径23.8厘米（图一七:6）。

标本S:6，浅灰色，折沿，沿面内侧有一道凹槽。外口径24.4厘米（图一七:5）。

标本S:3，鬲足，器身拍印中绳纹，足和裆底为粗绳纹（图一七:2）。

盆 标本S:7，灰色，折沿，圆腹，上腹抹平，外口径30厘米（图一七:7）。

圆陶片 标本S:2，利用灰色夹砂绳纹陶片制成，直径5.3厘米（图一七: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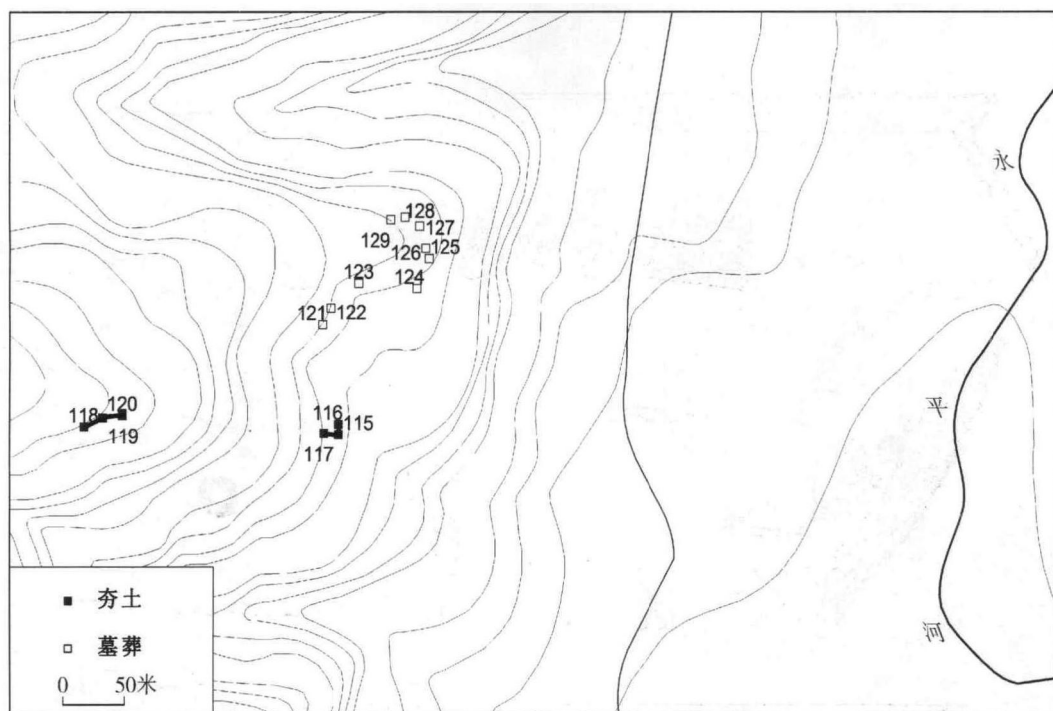
以上遗物均采集自城内西北部半山腰的居址区。

罐 标本S:10，寺洼文化长颈罐的颈肩部，黄色。采集自城外东侧山腰的寺洼文化墓地（图一七:10）。

（二）盐土崖墓地

盐土崖位于永平河的西岸、大堡子山西北约2公里的河边阶地。调查大堡子山城址期间，我们根据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在永平河西岸一带山地（当地人称“西山”）查看墓葬被盗情况，其中盐土崖是最重要的一处地点（图一六；图版一五:1）。

[11]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西汉水上游周代遗址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6期。



图一六 盐土崖遗址调查遗迹

1. 遗迹

盐土崖墓地地势平缓，南北长 200、东西宽 150 米，面积约 3 万平方米。据当地群众介绍，这里被盗的时间略早于大堡子山，一二十座被盗墓葬普遍出有青铜器，其中有铜鼎、壶等礼器。我们来这里调查时，当年密集的盗洞尚可分辨，地表遗物已十分罕见，只在一座新盗墓葬被翻出的土里拣到一件陶罐残片（图一七：11）。

盐土崖值得注意的地方还有两处夯土墙。较低的一处位于墓地南部（115~117 号），出露于地表 4.4 米以下，东墙长 8、南墙长 14 米，宽度均为 2 米，应是一座建筑的东南转角（图版一五：2）。另一处位于基地上方 40~50 米的一道东西向的断崖边（118~120 号），出露于地表 2 米以下，其上叠压一层 3~5 厘米的路土，夯土厚度只保存 0.6~0.8 米，宽 3 米余，总长 35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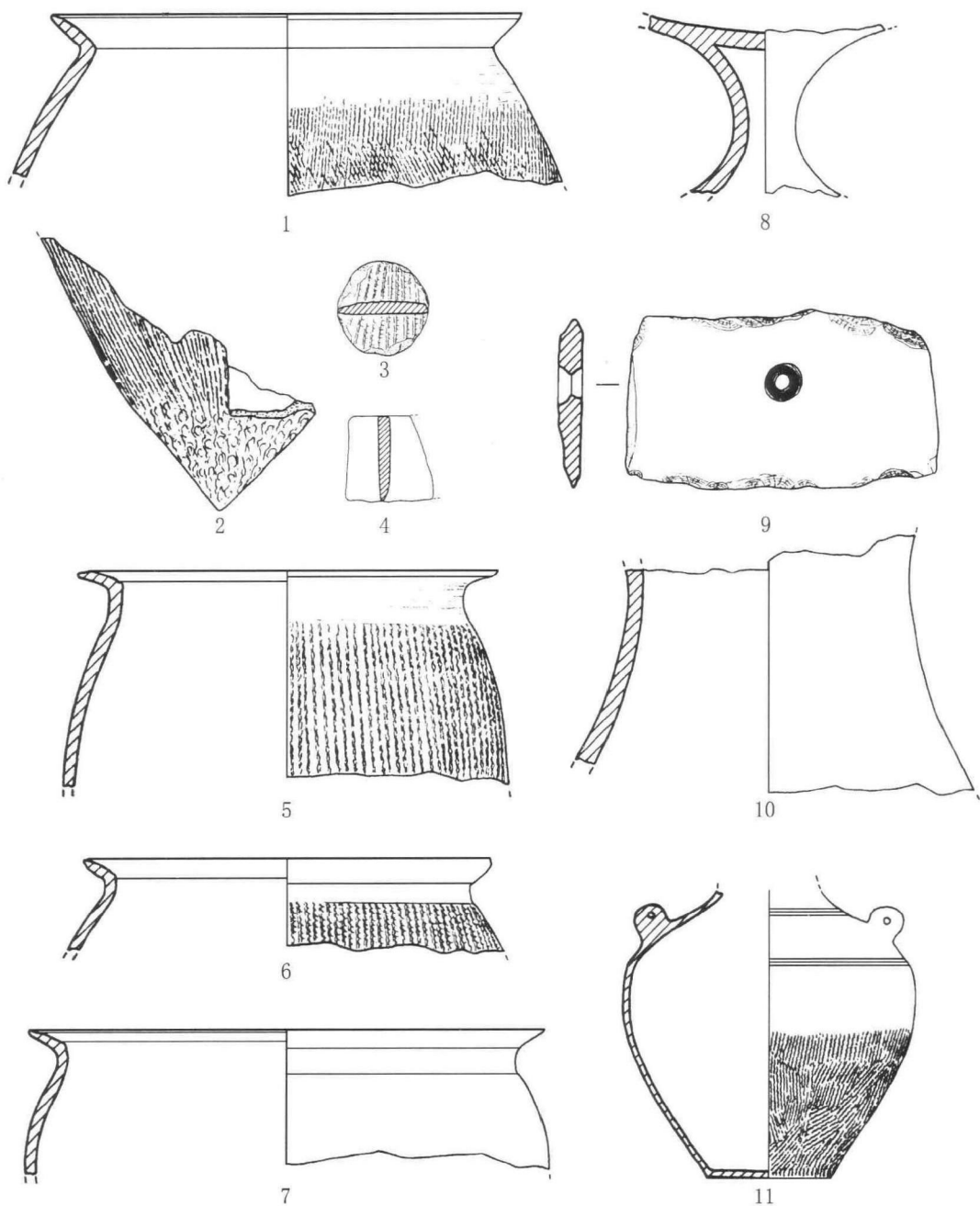
2. 遗物

罐 Y:1，采集自被盗墓葬。体较高，口残，广折肩，肩上有双耳，斜直腹，平底。肩和上腹磨光，有两组弦纹，下腹拍印绳纹。残高 32 厘米（图一七：11）。

豆 Y:2，浅灰色，细柄。残高 9.6 厘米（图一七：8）。

（三）小结

山坪城址和盐土崖墓地是在大堡子山城址被确认后，根据文献记载或当地群众提



图一七 山坪遗址与盐土崖墓地采集的陶、石器

1、2、5、6. 陶鬲 (S:9、S:3、S:6、S:8) 3. 圆陶片 (S:2) 4、9. 石刀 (S:4、S:1) 7. 陶盆 (S:7)
8. 陶豆 (Y:2) 10、11. 陶罐 (S:10、Y:11) (9为1/2, 11为1/8, 余为1/4)

供的线索发现的，虽然工作尚不深入，但对我们理解大堡子山遗址群有很大作用。

山坪遗址只有齐家文化和周代两个时期的遗存，城址的始建年代尚无确切证据，城外的寺洼文化墓地与城址的关系还有待解决，但推测为周代城址当不会有大的偏差。城内遗址区采集的陶器标本按其特征大约属春秋早、中期。

盐土崖墓地据传出土铜器的墓葬比例很高，虽然事隔多年，文物流失，目前已无法证实，但从夯土建筑的线索来看，这里属于一处贵族墓地的可能很大。根据新盗墓葬采集到的陶罐特征，这里至少有春秋早、中期的墓葬存在。

四、结 语

本次工作取得了以下几点收获：第一，发现了早期秦文化的中心遗址，加深了对早期秦人政治势力及生存状态的了解；第二，进一步认识了西汉水上游早期秦文化的面貌特征和年代序列；第三，进一步掌握了西汉水上游早期秦人聚落的布局；第四，加深了对早期秦文化与寺洼文化关系的了解。这里仅就前两个问题谈一下我们的看法。

（一）对西汉水上游秦文化陶器序列和特征的认识

我们对采集到的陶器标本进行了粗略排比，由此对西汉水上游秦文化的年代序列和特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下面对鬲、盆、豆、罐等几种主要器类的分析，依靠的是本次调查按单位采集获得的共存关系和器物自身的形态特征，并参考了秦墓分期和近年关中西部周文化陶器谱系研究的成果。由于缺少地层早晚关系的支持，可以说认识只是初步的，还需要今后不断修正和完善。

1. 鬲 按总体形态特征的差别可分3型。

A型 陶色多浅灰，侈口，卷沿或圆折沿，器身拍印中、粗绳纹，裆部上方正中一般有一小块抹平。又可分为6式。

I式 体高大，侈口，宽卷沿，沿面有一或二道浅槽，尖圆唇。器身饰粗绳纹，裆底和足根绳纹与器身类似。如标本 X79:1（图六:4）、D:24（图一二:4）。

II式 体高大，侈口，卷沿，沿面宽度中等，上有一道不清晰的凹槽，裆底和足根所施绳纹粗于器身。如标本 D:26（图一二:7）、S:3（图一七:2）。

III式 侈口，圆折沿，沿面窄，裆底和足根绳纹明显粗于器身，如标本 D:30（图一二:8）、标本 X80:1（图五:3）。

IV式 侈口，微折沿，沿窄小轻薄，沿面凹槽消失。如标本 D:18（图一二:1）。

V式 体高与宽近同，小平折沿，短颈，鼓肩，低裆，裆底戳印大麻点。如标本 X53:2（图五:5）、标本 D:21（图一二:2）。

VI式：体高与宽近同，敛口无沿，鼓肩，足根圆钝，低裆，裆底和足根戳印大麻

点。如标本 D:29 (图一二:3)。

此型陶鬲沿用时间很长,演变规律为体形由瘦高到矮胖;口沿由宽厚逐渐轻薄窄小,由卷沿演变为圆折、短平折沿,直至消失为敛口;早期沿面有两道凹槽,稍晚消失;肩部逐渐圆鼓;足由锥状逐渐圆钝;裆变矮,裆底和足根的绳纹起初与器身绳纹差别不大,而后明显粗于器身绳纹,最后改为戳印不规则形状的凹坑,即“大麻点”。

B型 陶色较深,体矮胖,高宽比接近,折沿方唇,沿面有两道清晰规整的凹槽,通体饰细绳纹,裆底和足根的绳纹与器身无异,裆上正中有鸡冠鬃,尖锥状足。此型陶鬲只一式,流行于早期,有仿铜鬲风格,但体量较大,皆为实用器,如标本 X75:1 (图五:1)。

C型 仿铜陶鬲。方唇,平折沿,沿面有两道清晰规整的凹槽。通体饰细绳纹,有扉棱和泥饼装饰。此型陶鬲只一式,流行于早期,或许由于属随葬品,发现数量较少,如标本 X163:1 (图五:2)。

2. 盆 可以分为5式。

I式 陶色较深,平折沿,沿面较宽,上有两道清晰规整的凹槽,束颈,折肩。器身上半磨光,有的装饰弦纹,下半拍印绳纹。如标本 X52:1 (图七:7)。

II式 陶色浅灰,折沿,沿面宽度中等,上有两道不清晰的凹槽,束颈,肩腹转折高度下移,器身上半抹平。如标本 D:37 (图一三:3)。

III式 折沿,沿面宽度中等,上无凹槽,圆腹,腹上半抹平。如标本 D:35 (图一三:1)。

IV式 窄折沿,沿面无凹槽,圆腹,腹上半抹平。如标本 D:25 (图一三:2)。

V式 窄平折沿,短直颈,圆腹,上腹有轮修痕迹。如标本 D:22 (图一三:4)。

盆的沿用时间较长,演变规律为口沿宽度渐窄,沿面凹槽由清晰规整逐渐模糊、草率,直至消失;腹部由转折位置较高而变低,由折腹演变为圆腹;早期的盆上腹磨光,制作精致,晚期只抹平绳纹,最晚的有多道轮修痕迹。

3. 豆 豆的早晚变化不甚明显,唯豆柄上的凸棱是一项显著特征。可以分为2式。

I式 盘较深,盘外凸棱清晰工整,制作精致,豆柄中部多有凸棱。如标本 X81:3 (图六:9)、X165:1 (图六:10)。

II式 盘较浅,盘外弦纹模糊,豆柄不见凸棱。如标本 D:1 (图一三:6)。

4. 罐 可以分为3式。

I式 体较高,侈口,束颈,广折肩,肩上有一对制作规整的耳。肩部装饰弦纹和细折线、交叉线,下腹拍印绳纹。如标本 X75:2 (图五:4)。

II式 体矮,喇叭口,束颈,圆肩,圆腹,耳退化无穿孔,或没有耳。口下出现未抹净的绳纹痕迹,下腹素面。如标本 D:38 (图一四:12)。

Ⅲ式 体矮，口径大于肩径（大喇叭口），束颈，溜肩，斜直腹，皆无耳，口下有未抹净的绳纹痕迹。如标本 X69:1（图五:7）。

罐的演变规律为体积由高大逐渐矮小，由折肩斜直腹变为圆肩圆腹、溜肩斜直腹；口由侈口变为大敞口，口径由小于肩径逐渐超过肩径；口下素面抹平，但有未抹净的绳纹痕迹；耳由制作规整穿圆孔逐渐退化，变得小而草率，最终消失；早期的肩上有篛纹装饰，晚期消失。

根据上述式别器物的共存关系，可以把采集陶器标本分为五期，参见表一：

表一 西汉水上游秦文化陶器共存关系与分期

鬲			盆	豆	罐	釜	孟	分期
A	B	C						
I	I	I	I	I	I			第一期
Ⅱ、Ⅲ			Ⅱ、Ⅲ	I	I			第二期
Ⅳ			Ⅳ	Ⅱ	Ⅱ			第三期
V			V		Ⅲ	√	√	第四期
Ⅵ								第五期

参照周文化陶器分期的成果，并对比近年发掘所获与各式陶器有共存关系的青铜器，可以对各期的年代做出大致判断：

第一期的B I式鬲、C I式鬲、I式豆、I式盆、I式罐与关中西部对比，具有西周晚期同类器的典型特征，如沿面流行清晰的凹槽，豆柄有凸棱等。这群器物曾在西山遗址的几座墓葬出现，并在一座较大的墓葬里与西周晚期鼎、簋、戈等铜器共存。值得注意的是，B I式鬲在西山遗址比较常见，而在大堡子山遗址十分罕见。第二期目前还没有较好的对比材料，但A II式鬲、II式盆与第一期的形态相似，估计年代也应接近。A II、A III式鬲出现于大堡子山打破大墓M3西墓道北壁的灰坑中。第三期的II式罐出现于大堡子山秦墓，据同出铜器推测，应属于春秋中期。第四期的III式罐、孟、釜与关中西部秦墓对比，具有春秋晚期同类器的特征。这群器物已出现于西山遗址多座典型秦墓。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次调查采集的标本可以分为五期，年代从西周晚期延续至战国早期，即第一期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初年，第二期相当于春秋早期，第三期为春秋中期，第四期为春秋晚期，第五期为战国早期。我们有关3座城址年代的看法即基于上述分期。

观察西汉水上游西周晚期的秦文化面貌，不难发现它具有明显的周文化风格。构成器物群的常见器类鬲、甗、盆、豆、罐、三足瓮等，都是周文化的典型陶器，其形

态和一些细部特征与同时期关中西部周文化基本一致。秦文化虽然与寺洼文化相邻，甚至共存于同一遗址，但陶器特点泾渭分明，目前还基本看不出寺洼文化的影响。

另一方面，西周晚期的秦文化已经表现出自身的特点。在器物群构成中，我们没有发现簋、红陶甗等关中西部常见的种类。在器物形态方面，几种器类都在不同程度上有不同于关中周文化的地方，例如B I式鬲裆中部的鸡冠鬃、A I式鬲相同部位的抹平；后来演变为秦式大喇叭口罐的I式罐在关中西部比较少见，但在西汉水上游却比较流行。

值得注意的是，B I式鬲、A I式鬲都是比较有地方特点的器物。B I式鬲的鬲足较高，尖锥状，饰细绳纹，调查时容易误认为西周早期的鬲足。A I式鬲的形体较高，宽卷沿，沿下角大，瘪裆，与西周早期的鬲粗看上去十分相似，但是它与B I式鬲共存，应属同一时期，而且在鸾亭山山顶西周中期的遗物中，还没有出现这种陶鬲。据关中西部周文化陶器谱系研究的成果，这种鬲实为西周晚期新出现的器形。由于后几式A型鬲是由这种形态演变而来，且延续性较强，断代时容易出现整体偏早的误差。

（二）关于城址性质的推测

在西汉水上游已知的秦文化遗址中，像西山、大堡子山、山坪这样有夯土城垣的遗址尚属首见，尤其是西山和大堡子山遗址，以其规模和内涵来说，无疑都是中心遗址，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两方面来讨论。

从考古材料的角度来看，西山遗址和大堡子山遗址的年代如前所述，即西山遗址比大堡子山遗址早一个阶段。西山城址的面积为8.7万平方米，大堡子山城址的面积为55万平方米，前者规模远远小于后者。西山遗址的文化堆积比较丰厚，而大堡子山遗址的堆积要贫乏一些，特别是相对于城址规模来看。西山遗址位于秦文化与寺洼文化势力交界地带，遗址本身即有大量寺洼文化遗物；大堡子山遗址位于形势险要的高山之上，与山坪遗址共扼西汉水上游最窄的峡口，遗址上罕见寺洼文化遗物。

从文献记载的历史背景来看，西周时期的秦人是周王朝在陇东地区培植的一支势力，用以牵制西戎，藩屏自身。从秦人的角度来说，他们一方面依附于周人，一方面又通过通婚等手段与西戎共处，保证自己的生存发展。早期秦人的中心名为犬丘，据《史记·秦本纪》对犬丘发生史事的记载，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犬丘至迟在周孝王时已经存在，其时当西周中期偏晚。

第二，犬丘有城邑，秦襄公长兄世父曾说：“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

第三，秦人居犬丘前期与戎人修好，可谓和平共处。

第四，周厉王末年（秦仲三年）戎人曾占领犬丘，消灭秦人大宗大骆之族。十余年后宣王即位，命秦地的小宗秦仲伐戎。宣王六年（秦仲二十三年）秦仲失败，被戎

所杀（此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后汉书·西羌传》则为宣王四年）。宣王又援助秦仲之子庄公，终于收复犬丘。自秦仲三年至庄公收复，秦人失守犬丘二十年以上。

第五，秦人复居犬丘后，直至襄公初年，犬丘附近的局势仍很紧张。襄公元年虽然把女弟嫁给戎王，但第二年戎人又围犬丘，并虏走襄公长兄世父。

根据以上几条关于犬丘的背景材料，对比考古调查所获信息，我们推测，西山城址即秦都邑犬丘的可能是存在的，它的繁荣时间、遗迹内涵、两种文化共存的情况和城址毁弃年代都可以和文献记载相对应。

至于大堡子山及山坪城址，我们推测，它们可能是秦人迁离犬丘后另建的都邑。秦人曾有迁都之举，文献虽无明确记载，但却有迹可寻。秦襄公二年（公元前 776 年），戎人曾围犬丘，其后犬丘之名就不再见于文献。《史记·封禅书》云：“秦襄公既侯（按：事在襄公七年），居西垂”。《秦纪》说襄公葬西垂，文公元年居西垂宫、死葬西垂，秦公的居、葬地（即秦人都邑）不再称犬丘而变为西垂。以往研究者多认为，《史记》中的西垂就是犬丘的别名，但我们认为，西垂并不等同于犬丘，而是相当于战国和汉代西县范围的大地名（参见后文）。《史记》对“犬丘”、“西垂”的使用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是否意味着襄公二年之后的都邑另有其地呢？值得注意的是，《秦纪》记载“宪公享国十二年，居西新邑”。“西新邑”的含义是“西”地之新邑，“新邑”之名显然是相对旧邑而言。由此我们知道，秦人在西地（西垂）除犬丘之外，确实另建过城邑^[12]。而这座城邑很可能就是大堡子山和山坪城址当中的一座。

上述推测还有以下几点可为佐证：第一，由《史记》分析，秦人迁都的时间可能在襄公二年至七年之间，即两周之际，这与西山衰落、大堡子山和山坪兴起的时间基本相符。第二，秦人迁都的原因可能是犬丘附近局势紧张，距戎人太近而且不易守卫，新都邑自然要寻求形势险要之地，这与西山、大堡子山和山坪的地理位置及形势相符。第三，襄公、文公时期，都邑虽在西垂，但秦人的主要力量已经东移，新都邑只是后方根据地，至宪公二年徙居平阳，新都邑使用时间不长，这与大堡子山和山坪遗址堆积不是很丰富相符。至于大堡子山和山坪两座城址哪一座可以与《秦纪》记载的“西新邑”具体联系，由于文献记载简略，很难指实，而且无论怎样联系，显然都会有一座城址为文献所失载。

应该承认，上述推测中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史记》对襄公七年至宪公之间的都邑为何仅称“西垂”而不是一个类似“犬丘”的具体地名。我们考虑这里有两

[12] 《秦纪》记载，秦公居地都是以初即位时为准（如“文公元年居西垂宫”，其实文公一生的主要活动已发展至关中。又如“宪公……居西新邑”，其实宪公二年即徙都平阳），宪公即位居“西新邑”，则“西新邑”至迟在文公末年已经存在。

种可能：其一，“西垂”不是当时当地真正的地名，而是后世文献的追称^{〔13〕}，当时具体的地名由于立都时间不长，随着大多数秦人东迁而被淡忘，没有在史籍上留下记载^{〔14〕}。其二，“西垂”是当时实际存在过的地名。只是由于襄公迁都之前其地无人居住，没有具体地名，典籍便以大地名“西垂”代称。

以上我们对西山、大堡子山和山坪城址的性质进行了推测，相信在西山遗址的早期遗存更加丰富、三座城址的始建年代最终确定、高等级建筑和墓葬经过发掘、对寺洼文化的研究更加深入之后，我们将会对城址的性质有更清晰的认识。

对“西垂”含义的理解，概括起来大致有三说：1. 垂本义为远边，西垂即为西陲（陲是垂的后起字），泛指西土，非一地之名。2. 为具体地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是也”。3. 为具体城邑，是犬丘的别名。《左传·隐公八年》（公元前715年）记载，卫地有“垂”，又名犬丘，“西垂”即为西方之“垂”（恰好《秦本纪》在一处称犬丘为西犬丘），是地名随族群迁移之例^{〔15〕}。

以上三说中，第一说为旧说，今已被多数人放弃。第二说与第三说虽都主地名，但一为大地名，一为小地名，实有很大不同，第三说认为西垂与犬丘是完全等同的。

所有的“西垂”皆出自《史记》，为方便分析，我们将原文及注文转录于下：

1. 其玄孙曰中湫，在西戎，保西垂。（《史记·秦本纪》）

2. 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邠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湫，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史记·秦本纪》）

3. 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史记·秦本纪》）

《正义》：注水经云秦庄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与大骆犬丘之地，为西垂大夫。《括地志》云：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是也。

4. 文公元年，居西垂宫。（《史记·秦本纪》）

5.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尝有助于唐虞之际，受土赐姓。及殷夏之间微散。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自穆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

〔13〕 我们认为“西垂”在《史记》中多数情况下是作为区域名使用的，但我们很怀疑当时真正的地名是不是“西垂”，根据出土文字资料，先秦时期这里的地名可能只是“西”。不过由于《秦纪》提到“西垂”，而一般认为《秦纪》是保留下来的秦人自己的典籍，所以这个问题还不能确定，或许将来能通过新的出土文字资料解决。

〔14〕 大堡子山秦公大墓 M3 的西墓道被春秋时期的灰坑打破，或许暗示着秦人上层东迁以后，这里很快即不被人所知。或者也可以推测，早期秦人的史事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留下文字记录。

〔15〕 段连勤《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地、族属问题》，《先秦史论文集》，《人文杂志》1982年增刊。

6. 襄公立，享国十二年。初为西畴。葬西垂。（《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纪》）

7. 文公立，居西垂宫。五十年死，葬西垂。（《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纪》）

8.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史记·封禅书》）

《正义》：汉陇西郡西县也。今在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也。

先来看目前最流行的第三说。这种说法无疑置于上列各条都能讲通，但仍有其问题存在。第一，在第3条文献中，犬丘与西垂并存，体会其意义，应有所区别。第二，按地名随族群迁移的说法，西垂在当时当地应该被称为“垂”，最多为了表示与东方的区别而称“西垂”^[16]，无论是叫垂还是西垂，其意义都来源于东方的垂地，与西土之意无关。如果发生地名演变或简省，应该保留“垂”而不会是西。但据《史记·周勃世家》、《汉书·地理志》等传世文献和秦公簠、“陇西郡戈”、秦封泥等出土文字资料，我们知道战国、汉代这里的地名都为“西”。一个在西周、春秋时名为“垂”或“西方之垂”的地方，怎么到了战国时就变为“西”了呢？显然这种可能远不如当地本名“西垂”（西陲之意）或就是“西”的可能大。

古史邈远难征，对于《秦本纪》之西垂、犬丘和《左传》之垂、犬丘，离开族群迁移的假设，是否就没有其他可能了呢？我们认为，一个显见的可能就是两者仅在字面上巧合^[17]，而含义完全不同。具体而言，西垂和西犬丘之“西”不一定是方位词，而可能就是地名本身。“西垂”不一定是指西方的“垂”地，而是具有“西陲”之意的专有地名。西犬丘不一定是指西方之犬丘，也可能是指西垂之地的犬丘或西地之犬丘，即小地名前缀大地名^[18]。

这种理解亦即前文提到的第二种说法。西垂是一片地方的名称，于上列各条文献也都可以说通。《括地志》、《史记正义》正是这样解释的，西垂是相当于汉代陇西郡西县的地方。特别是在第5条里，“秦兴，邑于西垂”，从语意看，把西垂作为一个区域名理解显然比“作邑于西方的垂地”更加顺适。应该注意的是，我们分析的《史记》是汉代文献，是后人追述前代历史，所有的“西垂”都不是源于第一手文献，而是司

[16] 实际仅从文献本身来看，当西方已经存在西垂时（西周孝王时），东方是否有垂地（鲁隐公八年）还不得而知（4处犬丘也有西早东晚的问题，自西而东在文献中出现的年代分别为西周孝王、西周懿王、鲁襄公元年和鲁隐公八年，严格讲并不能支持族群自东向西迁徙的假设）。而且根据众多地名迁移的例子，表方位的词多是后人所加，因此，按族群迁移的说法，当时当地称西垂的可能不是很大。

[17] 事实上，文献中至少有4处犬丘、2处垂和1处西垂，除了卫地的一处外（杜预说一地两名），没有证据表明其他的犬丘也名垂、或其他的垂地也名犬丘。

[18] “西犬丘”的叫法比较少见，《史记·秦本纪》五见“犬丘”，只一见“西犬丘”。这个叫法与“西新邑”类似，而“西新邑”显然是指“西”地之新邑而不是西方之新邑。

马迁用来追述秦人活动地点的一个词汇（例如第3条中的“西垂大夫”，众所周知，西周时期是没有这种称呼的），因此，理解司马迁对“西垂”一词的用法是前提。第5条文献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是“太史公曰”，正能反映出司马迁使用“西垂”一词的本意。

最后再来看一下久被放弃的第一说。西垂泛指西土，置于第1、2两条是能够说得通的（甚至第5条也可作两种理解）。第3条比较勉强，因为“某大夫”的大夫之前一般皆为地名。自第4条开始，以及6、7诸条，泛指的说服力已不足，不如以西垂为一具体地方理解起来通顺。故王国维《秦都邑考》先是针对前三条文献说：“以语意观之，西垂殆泛指西土，非一地之名”，而后又针对后几条文献说：“则又似特有西垂一地”。王国维的话看似模棱两可，但未尝不是客观的态度。后几处西垂为地名，是否一定意味着前两处西垂也是地名，恐怕没有证据下此结论。如前所述，“西垂”皆出自司马迁笔下，在第1、2条文献里，他完全有可能在“西方边陲”的意义上使用“西垂”这个词。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一种说法未必完全是错误的。在我们看来，这种说法还有其积极的意义，即揭示了西垂（或西）地名的来源：作为地名的西垂，其原意可能是指西方边陲。商周时期，这里正是中原青铜文化最西面的一个分布区，再向西皆为甘青诸青铜文化的领地。由于秦人的存在，这里被华夏所知，并视为西陲是很可能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西垂等同于犬丘的观点证据不足。西垂应该是大地名，而犬丘是邑名，是小地名。

附记：本次调查是在课题组各位专家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工作过程中得到了刘绪、徐天进、雷兴山先生的具体指导，刘绪、孙华、孙庆伟先生还对报告编写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早期秦文化研究课题组

组 长：赵化成

副 组 长：信立祥 焦南峰 王建新

杨惠福 王 辉

调查人员：曹大志 游富祥

绘 图：孙明霞 程 浩

执 笔：曹大志

附表一 2005~2006年甘肃礼县三座周代城址及相关遗迹调查表

点号	遗迹	体量(米)	备注
1	城墙		
2	城墙		
3	城墙		
4	城墙		
5	城墙		
6	城墙		
7	城墙		
8	灰坑		
9	城墙		
10	城墙		
11	城墙		
12	城墙		
13	城墙		
14	城墙		
15	城墙		
16	城墙		上压路土
17	城墙		上压路土
18	城墙		
19	城墙		
20	城墙		
21	城墙		
22	城墙		上压路土
23	城墙	宽 6.2	
24	墓葬		被盗
25	灰坑		袋状,共存寺洼陶片
26	城墙		
27	城墙		
28	城墙		
29	城墙		
30	城墙		
31	灰坑		袋状,共存寺洼陶片
32	城墙		
33	城墙		
34	城墙		
35	城墙		
36	地表		
37	城墙		
38	城墙		

点号	遗迹	体量(米)	备注
39	城墙		上压路土
40	陶水管		
41	灰坑	宽 3	共存寺洼陶片
42	灰坑	2.6×1.6	
43	灰坑		
44	灰坑		
45	地表		
46	灰坑		
47	窑	直径 1.8	
48	夯土	宽 0.75	
49	夯土	宽 18	
50	夯土	同上	
51	灰坑		打破 50 夯土
52	灰坑		
53	地表		
54	路土		
55	城墙	2×3-1.3	上压路土
56	灰坑		
57	灰坑		
58	灰坑		
59	墓葬		
60	墓葬		
61	墓葬		出寺洼罐、簋、豆
62	墓葬		出寺洼鬲、罐、豆
63	墓葬		
64	墓葬		
65	城墙		
66	灰坑		
67	房子	暴露 1.4	打破城墙
68	灰坑	宽 2.4	锅底状
69	墓葬		被盗,东西向
70	墓葬		
71	马坑	南北暴露 6	有夯土墙宽 0.5
72	墓葬		
73	灰坑		
74	灰坑		
75	墓葬	4.8	东西向
76	墓葬		

点号	遗迹	体量(米)	备注
77	灰坑	底宽 1.8	袋状
78	灰层	10.3	共存寺洼陶片
79	灰坑	底宽 1.68	袋状
80	灰坑	宽 1.5	筒状
81	灰坑		
82	灰坑		共存寺洼陶片
83	灰坑		共存寺洼陶片
84	灰坑		共存寺洼陶片
85	墓葬		采集寺洼鬲足
86	灰坑		共存寺洼陶片
87	灰坑		
88	灰坑		共存寺洼陶片
89	地表		
90	路土		
91	灰坑		
92	灰坑		
93	灰坑	3.2 × 2.1	筒状,共存寺洼陶片
94	灰坑	宽 4	共存寺洼陶片
95	墓葬		
96	墓葬	宽 1	南北向
97	墓葬	宽 0.8	南北向
98	墓葬	宽 1.5	南北向
99	灰坑		
100	灰坑		
101	灰坑		
102	地表		
103	墓葬		
104	陶水管		
105	灰坑		
106	地表		
107	地表		水管残片、寺洼陶片
108	灰层	宽 12	共存寺洼陶片
109	路土		
111	城墙		
112	城墙		内侧上压路土
113	城墙		
114	城墙		
115	夯土		盐土崖
116	夯土		盐土崖

点号	遗迹	体量(米)	备注
117	夯土		盐土崖
118	夯土		盐土崖
119	夯土		盐土崖
120	夯土		盐土崖
121	墓葬		盐土崖
122	墓葬		盐土崖
123	墓葬		盐土崖
124	墓葬		盐土崖
125	墓葬		盐土崖
126	墓葬		盐土崖
127	墓葬		盐土崖
128	墓葬		盐土崖
129	墓葬		盐土崖
130	城墙		
131	泉		
132	墓葬		大雪坪
133	墓葬		大雪坪
134	墓葬		大雪坪
135	墓葬		大雪坪
136	墓葬		大雪坪
137	墓葬		寺洼墓
138	墓葬		寺洼墓
139	墓葬		寺洼墓
140	城墙		
141	城墙		
142	灰坑		
143	墓葬	1.8 × 1.4	被盗秦墓
144	灰坑		
145	墓葬		
146	城墙		
147	城墙		
148	城墙		
149	城墙		
150	城墙		
151	城墙		
152	城墙		
153	城墙		
154	城墙		
155	城墙		

点号	遗迹	体量(米)	备注
156	城墙		
157	城墙		路土
158	城墙		
159	城墙		
160	城墙		
161	城墙		
162	城墙		
163	墓葬		鸾亭山被盗
164	灰坑		鸾亭山
165	灰坑		鸾亭山
166	夯土		鸾亭山
167	墓葬		
168	墓葬		
169	灰坑		
170	墓葬		
171	灰坑		
172	灰坑		
173	灰坑		
174	灰坑		
175	灰坑		
176	墓葬		
177	墓葬		
178	灰坑		
179	灰坑		
180	墓葬		
181	夯土		已发掘 21 号
182	夯土		
183	墓葬		
184	墓葬		
185	夯土		有石头
186	夯土		有石头
187	夯土		有石头
188	路土		
189	马坑		
190	马坑		
191	夯土	宽 2.5	
192	夯土	宽 1.3	
193	夯土		
194	夯土	长 28	

点号	遗迹	体量(米)	备注
195	夯土	同上	
196	夯土	长 10	
197	灰坑		
198	灰坑		
199	灰坑		
200	灰坑		
201	灰坑		
202	墓葬		被盗, 传出编钟
203	墓葬		被盗
204	灰坑		打破 M3 西墓道
205	灰坑		打破 M3 西墓道
206	灰坑		
207	灰坑		
208	灰坑		
209	灰坑		
210	灰坑		
211	房子		见葵纹瓦当、菱形纹 地砖
212	灰坑		
213	墓葬		
214	墓葬		
215	墓葬		
216	墓葬		
217	墓葬		
218	墓葬		
219	墓葬		
220	墓葬		
221	墓葬		
222	墓葬		
223	墓葬		
224	墓葬		
225	墓葬		
226	墓葬		
227	墓葬		
228	墓葬		
229	墓葬		
230	墓葬		
231	墓葬		
232	墓葬		

点号	遗迹	体量(米)	备注
233	墓葬		
234	墓葬		
235	墓葬		
236	墓葬		
237	墓葬		
238	墓葬		
239	墓葬		
240	墓葬		
241	墓葬		
242	墓葬		
243	墓葬		
244	墓葬		
245	城墙		内侧有路土
246	城墙	宽 6.2 米	
247	城墙		
248	城墙		
249	城墙		内侧上压路土
250	城墙		
251	城墙		
252	城墙		
253	房子	东西宽 9.6	
254	房子	东西宽 15.6	
255	墓葬		
256	墓葬		



西山遗址远景（自北向南摄）

甘肃礼县西山城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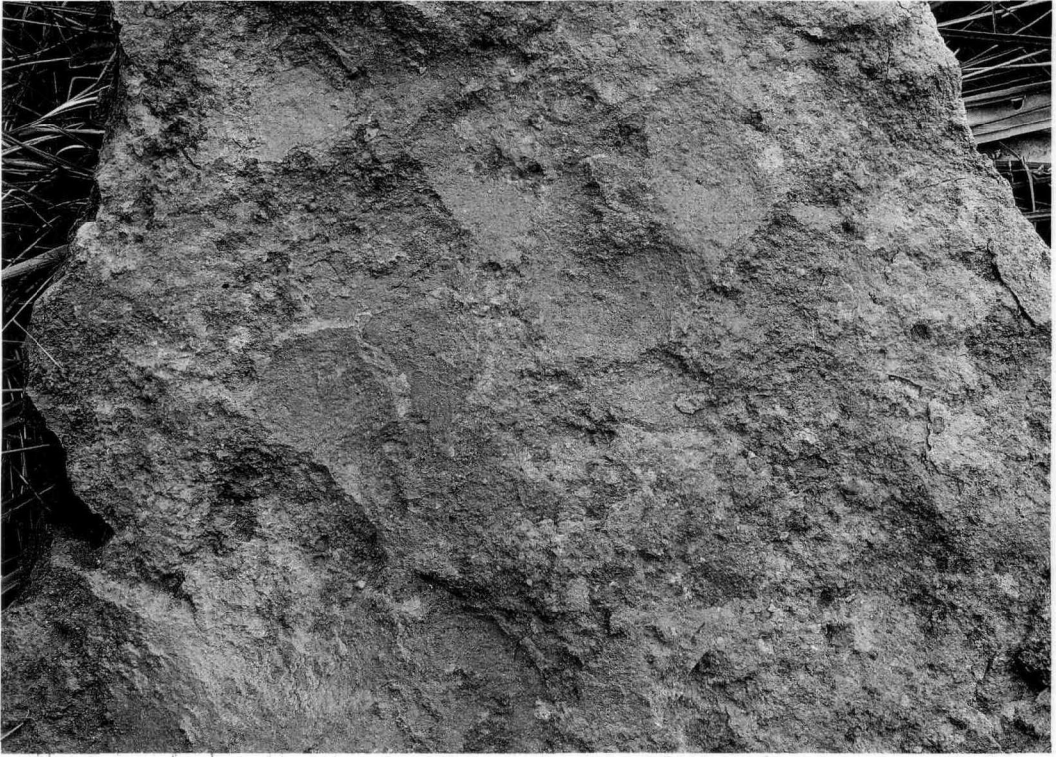


1. 西山城址东墙版筑痕迹 (6号)



2. 西山城址北墙夯层 (19号)

甘肃礼县西山城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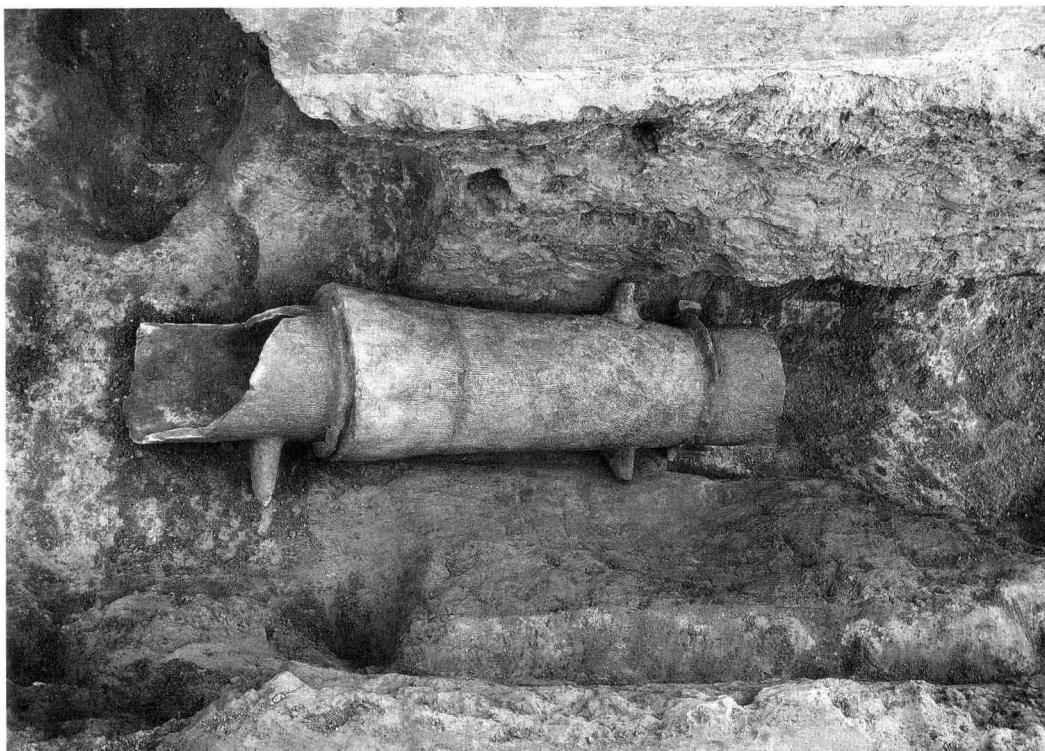


1. 西山城址城墙夯窝 (28号)



2. 小房址居住面下的鬲棺 (婴儿瓮棺)

甘肃礼县西山城址



1. 陶排水管道（40号，左端朝向山上）



2. 陶排水管道上的刻画符号

甘肃礼县西山遗址出土的陶排水管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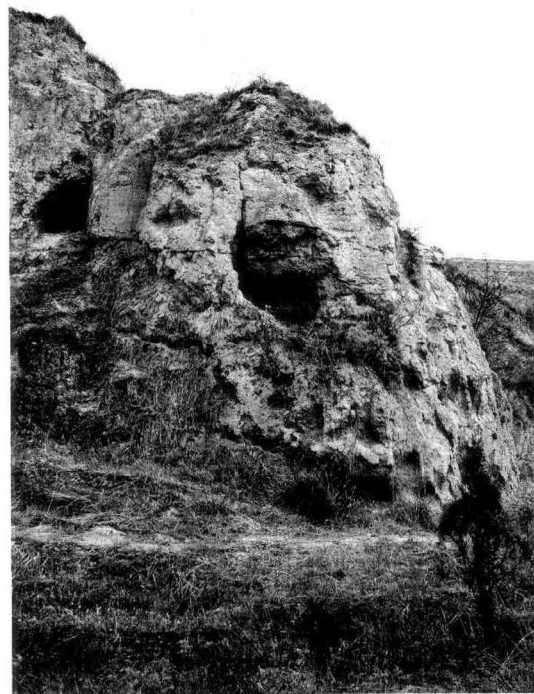


大堡子山远景（自东向西摄）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城址



1.大堡子山城址西北角夯土台



2.大堡子山城址北墙横剖面(246号)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城址



1.大堡子山城址城墙夯窝 (111号)



2.夯土基址 (185号)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城址



1.自大堡子山远望山坪遗址（自北向南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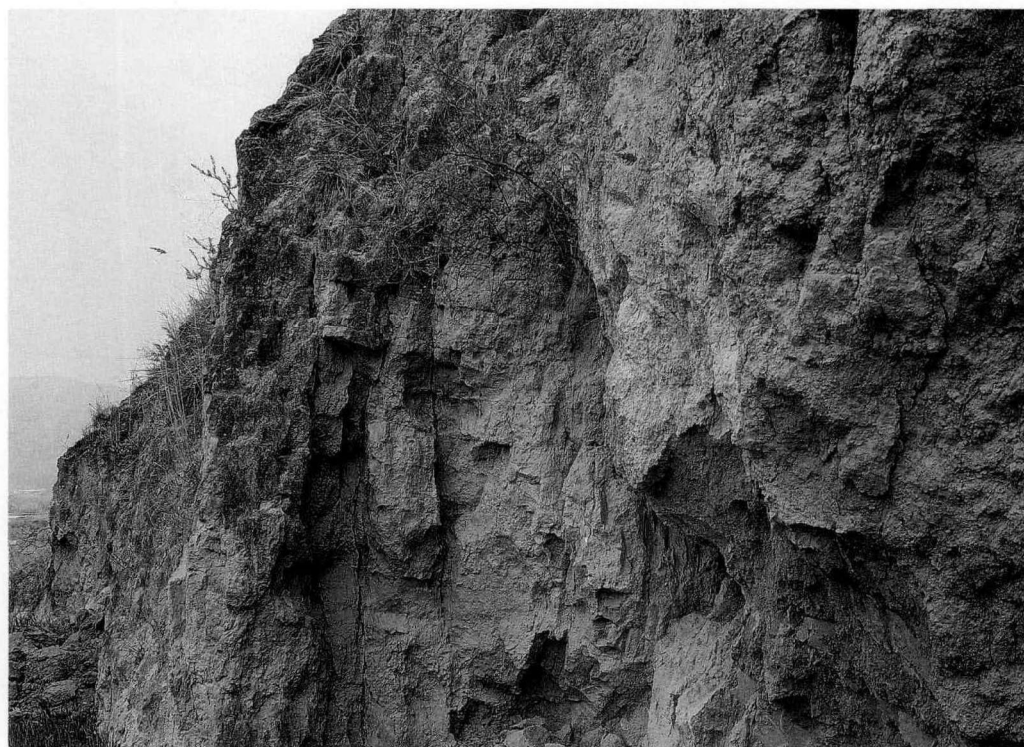


2.山坪城址东城墙（151、152号）

甘肃礼县山坪城址



1. 盐土崖墓地



2. 盐土崖墓地夯土建筑 (115号)

甘肃礼县盐土崖墓地